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一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九年九月

# 晚唐高駢開鑿安南「天威遙」運河 事蹟釋證——以裴鏘所撰 《天威遙碑》為中心的考察

王承文\*

晚唐懿宗咸通年間，高駢率領唐軍從南詔手中收復安南都護府後，開鑿了一條人工運河——「天威遙」，以疏通安南海上通道。其直接原因，是晚唐對安南地區數額巨大的軍需糧餉運輸，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唐朝安南海上通道在政治、軍事和海外貿易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一事件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正史等資料對此均有專門而簡略的記載。作為高駢幕僚的裴鏘則撰有《天威遙碑》，詳盡地記載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文考察了歷史上《天威遙碑》文本的流傳、「天威遙」的確切地點以及漢唐時期安南海上通道的重要意義。同時認為，《天威遙碑》等大量資料將這一工程的最終完成歸功於「雷公電母」，是北方官員士大夫與北部灣沿岸所盛行的「雷神」信仰關係密切的反映。

關鍵詞：晚唐 高駢 安南都護府 天威遙運河 北部灣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唐懿宗咸通七年（866），高駢率領大軍從南詔手中收復安南都護府，是晚唐中央王朝在邊疆地區所進行的重大軍事行動。高駢在鎮守安南期間，曾經有過一系列的政治軍事作為，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開鑿「天威遙」以疏通安南海上通道。「天威遙」實際上也是中國古代唯一的一條海上運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條工程浩大的運河差不多已經被人們徹底遺忘了。高駢開鑿運河的直接原因，是晚唐對安南地區數額巨大的軍需糧餉運輸，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唐朝安南海上通道在政治、軍事和海外貿易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一事件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正史等資料對此均有專門而簡略的記載。作為高駢幕僚的裴鏘則撰有《天威遙碑》，詳盡地記載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不過，由於高駢和裴鏘都與道教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又使得這篇碑文充滿了撲朔迷離的神異色彩。因此，這篇碑文中具有傳奇性的記載與歷史事實本身之間的關係，則尚需要加以詳細辨析。本文考察了歷史上《天威遙碑》文本的流傳、「天威遙」的確切地點以及漢唐時期安南海上通道的重要意義。同時認為，《天威遙碑》等大量資料將這一工程的最終完成歸功於「雷公電母」，是北方官員士大夫與北部灣沿岸所盛行的「雷神」信仰關係密切的反映。

## 壹·裴鏘所撰《天威遙碑》及其文本的流傳

晚唐裴鏘所撰《天威遙碑》目前存世的錄文共有三種版本，最早的收入元代越南史學家黎崱的《安南志略》，稱為《天威徑新鑿海碑》；<sup>1</sup> 其次是明代後期李文鳳所編《越嶠書》，稱為《天威涇廳（新）鑿海碑記》；<sup>2</sup> 最後是清朝嘉慶十九年（1814）編成的《全唐文》，稱為《天威徑新鑿海派碑》。<sup>3</sup> 該碑在南宋

---

<sup>1</sup> 黎崱撰，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九，頁232-236。

<sup>2</sup> 李文鳳編，《越嶠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1997〕，史部，第163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卷一七，頁163-164。根據清代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四〈《越嶠書》跋〉和汪森《粵西文載》卷七〇的記載，李文鳳為明朝廣西慶遠人，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見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318冊），頁156；汪森，《粵西文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67冊），頁227。

<sup>3</sup>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八〇五，頁8463-8464。

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和清代阮元的《廣東通志金石略》中，又簡稱為《天威遙碑》。<sup>4</sup>

現存《天威遙碑》三種版本之間差異亦比較明顯。《安南志略》所收碑文雖然最早，然而文字闕損訛誤很多。近年來，中外研究者多以《全唐文》的錄文來校正和補充。<sup>5</sup>《越嶠書》早於《全唐文》兩百多年，其錄文字句最為完整，然而錯字較多。由於該書在《四庫全書》中未收，因而其所收碑文前人甚少關注。《全唐文》所收碑文雖然文義最為通雅，然而清人加工的痕跡也比較明顯。除了一些錯字外，甚至可能還有意刪削了某些字句，致使一些文句難以索解。因此，我們試將《全唐文》中的《天威徑新鑿海派碑》彙錄，並根據《安南志略》尤其是《越嶠書》的錄文校正補充如次：

〔唐靜海節度掌書記朝議郎右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鋼撰〕

巨浸無涯，接天茫茫。狂飆捲颺，駭浪屹起。若流〔玉〕堆而走雪岫，瞬息萬里皚皚然。縱天英（吳）之神威，亦不能抑遏其勢。長鯨憂其蹭蹬，巨鼇困其擺闔。水族之偉者尚不得安，況橫越之舳艫，焉能利涉耶？即摧檣裂帆，覆溺而不可拯。有之乎？今天威徑者，自東漢馬伏波欲剪二徵，將圖交趾，煎熬饋運，間闕滄溟，乃鑿石穿山，遠避海路。及施功用，死役者不啻萬輩，竟不遂其志。多為霆震山之巨石，自巔而咽之。伏波無術，不能禁，乃甘其息。自唐皇（皇唐）有三都護，〔聆〕其舊跡，俱〔扼腕忿禁〕，〔盡〕欲繼其事。遂命疊燎沃醢，力殫物耗，踵前功而不就。又各殫數千夫，積骸於逕之畔。邇者無有敢議其事者。

自僕射渤海公剪蕩蠻夷，跨逾滄漲，削平交趾，克服郡城，錯磨鋌刃，駐蹕卒伍。然運粟走食，尚阻洪濤。召術徵謀，未閱長策。渤海公曰：我再有丹徵，重闡皇風，聚兵安人，須便於事。遂命攝長吏（史）林諷（訊）、湖南軍都將余存古等，部領本將兵士並水手等一千餘人，往天威徑而疏鑿之。渤海公諭之曰：天道助順，神力扶直。今鑿海派，用拯生靈。苟不徇私，何難之有？前時都護，乃犒師不至，持法不堅，博約營

<sup>4</sup>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一，頁33；阮元主修，梁中民校點，《廣東通志金石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111。

<sup>5</sup> 潘文閣、蘇爾夢主編，《越南漢喃銘文彙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巴黎：法國遠東學院，1998），頁33-35；《安南志略》卷九，頁232-236。

私，人須急情；今我則不然，只要濟其王事耳。諷（訊）等遂唯而去。自咸通九年四月五日起手，操持鋤鍤，豐備資糧，銳斧剛鑿，刊山琢石。是石堅而頑，盤而厚，併手揭折，斲力鐫槌，逾月之間，似欲開濟，但中間兩處，值巨石嶄嶄焉。繚互數丈，勁硬如鐵，勢不可減。鑿下刃卷，斧施柄折。役者相顧，氣沮手柔，莫能施其巧矣。至五月二十六日當晝，忽狂雲興，怒風作，窺林若暝，視掌如瞽。俄有轟雷燐電，自勵石之所，大震數百里，役者皆股慄膽動，掩聰蔽視。移時而〔視〕，四境方廓。眾奔驗視，其艱難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落者，約人而不能舉〔者〕，俱為雷之攫掣擲於兩峰耳。又其西堅確之石，至六月十一日，後（復）大震如初，霆雷之赫怒迅烈，復逾於東之所震者。眾復驗之。是日以磨泯若有所失，旁之盤陀者，亦碎裂數十丈。又其西復值巨石，亦不可措手。工人息攻，皆仰恃穹昊，意有所待。復興雲，雷又大震，巨石乃隳裂，有泉迸出，味如甘醴。

此乃乾坤拯助，造化扶持，迴換艱難，一瞬夷坦，皆渤海公心無私戚（契），精貫上元，使列缺之與豐隆，矜神功而誇妙用。〔靈祇陰相〕，風雲接助，增益勳庸。感應如斯，古無儔匹。遂使決洩一派，接引兩湖。中間合流，無纖阻窒（滯）。經過卒校，梯溟漲而不艱危；趨運倉儲，棹舟航而無覆沒。凡涉交趾，履險之處，〔其處三焉〕，昔如覆冰。宋洞沙之鋒觜，耕其淪漣；女漚灣之石頭（角），湧其沸騰；大蒙神之山腳，蹴其洶湧。舟人所歷，毛髮自寒。今則安流坦途，不復經斯險矣！於戲！渤海公之功績，與鑿汴渠、開桂嶺，可等肩而濟其震區耳。諷（訊）與存古，勤潔奉公，精專辦事；指麾之外，更能審曲面勢，伐山徵材，結構高亭，創修別館。泉驅來而走碧，橋架險以橫虹。神室雷祠，道堂僧署，無不克備，皆能顯宏。至其年九月十五日畢工。諷（訊）、存古等堅請刻石紀次（功），以示曠代。渤海公從之。因命於掌記直書其事。銅鑄當秉筆，不敢退讓。銘曰：天地汗漫，人力微茫。渡危走食，冒險駕航。脫免者稀，傾沈是當（常）。我公振策，勵山鑿石。功施艱難，霆助震激。洩海成派，泛舟不窄。渤海（溟漲）坦夷，得餉我師。天道開泰，神威秉持。〔咸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建〕

歷史上有關《天威遙碑》作者裴鏘身世的記載比較缺乏。《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書，稱之為「高駢從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裴氏出於絳

州聞喜。其「中眷」裴氏在裴行儉之後，裔孫有裴鉞、裴鋬、裴鏐等人，並從金旁取名，而年輩又與裴鏐相當。因此，裴鏐之族系里籍很可能與此有關。<sup>6</sup> 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稱裴鏐「作《傳奇》行於世」。<sup>7</sup> 裴鏐所撰《傳奇》是一部對後世小說、戲曲影響最大的唐人傳奇集。<sup>8</sup> 該書雖已散佚，然而其主要內容仍保存在《太平廣記》等典籍中。北宋著名道教學者張君房所編《雲笈七籤》，收錄有〈道生旨〉一篇長文，題為「谷神子裴鏐述」，反映了作者具有非常深厚的道教義學修養。該文開篇曰：「鍾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壇焉。壇側有棲真子楊君，知余有道，詣予，請述道生之宗旨。」<sup>9</sup> 說明裴鏐也是一個典型的道教信徒，有道號名谷神子，曾經修道於鍾陵郡（或稱豫章郡）即洪州的西山（今江西南昌市附近的新建縣西）。洪州西山主要奉祀晉朝著名道士許遜，從東晉南朝以來，一直是江南道教傳播發展的重鎮之一，也是後來宋元時期重要道派淨明道的發源地。裴鏐的《傳奇》中有〈許棲巖〉一文，也反映了其對《老子》、《莊子》和《黃庭經》祕旨的深入領悟。<sup>10</sup> 因而，與同類的唐代其他小說相比，裴鏐《傳奇》一書表現了更加濃厚的道教色彩。

自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開始，崛起於今雲南的南詔政權在安南部分溪洞豪族的配合下，三次大規模進攻安南都護府，兩次攻陷了安南都護所在的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sup>11</sup> 並進而攻陷了嶺南西部重鎮邕州（今南寧市）。唐朝數路大軍先後敗亡，朝野震驚。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七月，幽州人秦州刺史高駢（821-887）臨危受命，出任安南都護，率軍抵禦南詔。至咸通七年十一月，高駢大敗南詔，收復了安南。唐朝遂於安南設置靜海軍，高駢升為靜海軍節度使。

<sup>6</sup>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頁2213-2214；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纂異記》《傳奇》校釋〉，頁78。

<sup>7</sup> 計有功輯撰，《唐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六七，頁1011。

<sup>8</sup> 參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四一，〈莊嶽委談下〉，頁555。

<sup>9</sup> 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八八，頁1958-1966。

<sup>10</sup>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四七，〈神仙·許棲巖〉，頁294。

<sup>11</sup>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四年（863）正月，頁8103。

裴鏘結識並追隨高駘應在高駘出征安南之前，即在高駘尚任秦州刺史時，其後隨之在安南擔任了高駘幕府從事。咸通九年（868）九月，高駘辭靜海軍節度使之職，轉赴長安任右金吾大將軍。咸通十年（869）十二月，任天平軍節度使、鄆州刺史（治所在今山東東平縣境內）。隨後，南詔再次向唐朝西川等地發動大規模進攻，並圍攻成都。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十二月，高駘奉命赴西川「制置蠻事」。從乾符二年（875）正月至五年正月，高駘任成都尹、西川節度使，多次挫敗南詔進犯，迫使南詔求和。《唐詩紀事》記載，乾符五年，裴鏘「以御史大夫為成都節度副使」，「時高駘為使」。自咸通九年至乾符五年僅十年時間，裴鏘即從官階較低的「節度掌書記」，超升為成都這一著名方鎮的「節度副使」，即高駘的副手，關鍵應在於其與高駘之間的密切關係。乾符五年正月，高駘自劍南西川節度使移鎮荆南，六月又被唐朝任命為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以阻遏王仙芝的起義軍。裴鏘其時所作〈題石室詩〉稱：「更歎沱江無限水，爭流只願到滄溟」，<sup>12</sup> 表示雖不能成行，但內心仍有意再追隨高駘東行。

宋代趙彥衛認為裴鏘《傳奇》一書，屬於準備參加唐朝進士考試的「溫卷」作品。<sup>13</sup> 李宗為認為，《太平廣記》中所保存的裴鏘《傳奇》諸篇，故事所涉及的年代大多為貞元至大和年間，最晚至唐宣宗大中年間，地點大多在長安附近和河洛地區。另有涉及江淮者六篇、邊塞五原者二篇、南海交州者五篇，因此，《傳奇》的成書應在高駘改授天平軍節度使、鄆州刺史之前。根據該書中故事發生的地點，可以確定裴鏘完成於其任職於高駘安南幕府時。<sup>14</sup> 而王夢鷗則認為《傳奇》亦有涉及西蜀的，因此，該書完成在裴鏘晚歲不在高駘身邊時。<sup>15</sup> 由於裴鏘親身經歷了開鑿「天威遙」運河這一歷史事件，因而其《天威遙碑》的記載具有極高的可信性。

至於裴鏘《天威遙碑》撰成的時間，一九九八年，法國遠東學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整理出版了《越南漢喃銘文彙編》。該書根據黎崱的《安南志略》收錄了這篇碑文，並稱該碑撰寫於咸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即公元八七〇年二月十七日。<sup>16</sup> 然而，《安南志略》錄文中的「咸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建」，可能並非裴

<sup>12</sup> 《唐詩紀事》卷六七，〈裴鏘〉，頁1011。

<sup>13</sup> 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抄》（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八，頁115。

<sup>14</sup> 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39。

<sup>15</sup>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傳奇》校釋》，頁89。

<sup>16</sup> 《越南漢喃銘文彙編》，頁31。

鏘撰寫碑文的時間。裴鏘在《天威遙碑》中已經明確記載：「至其年（即咸通九年）九月十五日畢工。（林）諷（訊）、（余）存古等堅請刻石紀次（功），以示曠代。渤海公從之。因命於掌記直書其事。鏘謬當秉筆，不敢退讓。」說明裴鏘撰寫這篇碑文其實是親受高駢之命。根據《資治通鑒》記載，咸通九年（868）八月，高駢「請以從孫（高）潯代鎮交趾，從之」。<sup>17</sup> 由於長安與安南之間道程十分遙遠，從朝廷發佈詔令到高駢正式離開安南，大概需要三個月以上。因此，碑文應撰寫在高駢離任之前。宋代王象之《輿地碑記目》稱《天威經新鑿海派》，「咸通九年靜海軍管書記裴鏘撰」。<sup>18</sup> 可見碑文實撰成於咸通九年，清代學者阮元稱：「謹案：碑無年月。《通鑒》：『懿宗咸通七年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八年，駢以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募工鑿之，漕運無滯。』據此，則碑之刻當在是時矣。」<sup>19</sup> 不過，《天威遙碑》撰成在咸通九年，而其以「巨石勒功徑上」，<sup>20</sup> 即正式刊刻在「天威遙」運河工程的原址，則應晚至咸通十一年正月了。

《安南志略》卷九〈高駢傳〉後所附《天威徑新鑿海碑》錄文，<sup>21</sup> 黎則已注明該碑「見《邕志》」。所謂《邕志》即《邕州志》，其作者不明，撰成年代大致在南宋時期。明初《永樂大典》之〈南寧府〉多次徵引《邕州志》。<sup>22</sup> 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等編定的《文淵閣書目》卷一九即著錄有《邕州志》一冊。然而該書至清朝「已佚」。<sup>23</sup> 與《越嶠書》和《全唐文》的錄文比較，雖然《安南志略》的錄文在流傳中已有多處闕略和文字訛誤，但是仍可判定三者出自同一來源。《安南志略》和《越嶠書》的錄文前，還署有「唐靜海節度掌書記朝議郎右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鏘撰」。但是《全唐文》編纂者在收入該文時則削去了碑前題署。另外，《安南志略》和《越嶠書》所錄碑文後尚有「咸通十一

<sup>17</sup> 《資治通鑒》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八月，頁8121。

<sup>18</sup> 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2冊），卷三，〈邕州碑記〉，頁555。

<sup>19</sup> 《廣東通志金石略》，頁111。

<sup>20</sup> 《安南志略》卷九，《天威徑新鑿海碑》的宋人跋文，頁235。

<sup>21</sup> 《安南志略》卷九，頁232-236。

<sup>22</sup> 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6），卷八五〇六，〈南寧府·分野〉，頁3931；卷八五〇七，〈南寧府二〉，頁3934。

<sup>23</sup> 謝啟昆等編，《廣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80冊），卷二一四，〈藝文·史部·地理類〉，頁105。

年正月十三日建」。而且碑文之後還錄有宋代佚名所刻跋文。《安南志略》所收跋文原文中闕字較多。《越南漢喃銘文彙編》對原文作了一定的校補和標點，其文爲：

交趾南〔越〕故封，咸通中，渤海公高駢南征，開治糧道。其助真順震師。巨石勒功徑上。〔皇〕名「天威」。下迨昭、僖，中原多故，逐（遂）置疆場之外。我宋因之，以威〔德〕懷得不治。外□道霍侯守邕，霍中謹也，偶得模本，慮在異域，堙廢無傳，於是命工刊石於大廳之右；蓋其意者，欲示遠人，使知皇家聖度，歲修職貢而不怠也。紹聖五年正月二十一日。<sup>24</sup>

由於《越嶠書》中所保存的這段宋人跋文還非常完整，因而可以將《安南志略》中的跋文校正補充完備，並重新標點，其文如下：

交趾，〔安〕南故封。咸通中，渤海公高駢南征，開治糧道。其助真順，震師巨石，勒功徑上，皇名「天威」。下迨昭、僖，中原多故，逐（遂）置疆場之外。我宋因〔懷〕之以德，得不治〔之道〕。霍侯守邕，霍中謹（《越嶠書》作霍中謹也，偶得模本，慮在異域，堙廢無傳，於是命工刊石，〔植之〕於大廳之右；蓋其意者，欲示遠人，使知皇家聖度，歲修職貢而不怠也。紹聖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在以上北宋哲宗紹聖五年（1098）正月的跋文中，所謂「下迨昭、僖，中原多故，逐（遂）置疆場之外。我宋因〔懷〕之以德，得不治〔之道〕」，是指在唐末開始的中原地區的戰亂中，安南得以自立於中國中央王朝的管轄之外。北宋建立後，中央王朝對安南實行的是「懷柔」和「羈縻」的政策，從而維持了安南對宋朝的藩屬和朝貢關係。至北宋哲宗紹聖年間，鎮守邕州的霍中謹「偶得模本」即該碑的拓本，因憂慮這一通具有政治意義的重要碑銘地處南部邊陲和「異域」而「堙廢無傳」，所以特地命令將該碑重新刊刻在邕州政事大廳。其用意在於使安南李氏王朝「知皇家聖度，歲修職貢而不怠」。

兩宋時代，在原唐朝安南都護府所統轄的地區已出現了獨立的交趾國。交趾李氏王朝（1010-1225）在與宋朝接壤的邊界地區不斷挑釁和進犯。由於宋代北方邊患始終十分嚴重，因此宋朝對此大多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冬，交趾分三路入寇，連陷欽、廉二州，殺守臣蘇緘，吏民被殺者數十萬

<sup>24</sup> 見《越南漢喃銘文彙編》，頁35。

人。第二年春又攻陷了作為廣南西路政治軍事重鎮的邕州。<sup>25</sup> 宋神宗與宰相王安石遂下令征討，收復了欽、廉、邕三州。交趾國王李乾德被迫上表請和。與宋代交趾王朝在邊境的威脅相聯繫的，就是「伏波廟」在嶺南各地大量興起。東漢初伏波將軍馬援出兵交趾征討二徵，成為中央王朝經營南部邊疆的象徵。而晚唐的高駢則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其前期軍功顯赫，為唐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其晚年則因所謂「玩寇崇妖」最終身敗名裂。歐陽修編纂《新唐書》即直接將其列入〈叛臣傳〉。但是，高駢在國力已經極度衰弱的晚唐時代，率大軍一舉收復安南，其輝煌的功業也很為宋人稱道。因此，宋哲宗紹聖五年（1098），鎮守邕州的霍中謹命令將《天威徑新鑿海碑》重新鐫刻在邕州政事大廳，即有藉此緬懷高駢功業和宣示宋朝國威的意義。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四年（1177），溫州嘉興人周去非在廣西欽州、桂林等地出任地方官，其成書於淳熙五年（1178）的《嶺外代答》，詳細記載了其在廣西的見聞，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兩宋時代，「天威遙」所在的江山半島已歸屬於欽州管轄，且離欽州治所不遠，因此，先後兩次擔任欽州州學教授的周去非，<sup>26</sup> 完全有可能曾經親臨「天威遙」一帶考察過。《嶺外代答》卷一專門記載了《天威遙碑》，其文曰：

欽之士人曾果，得唐人《天威遙碑》，文義駢儷，誠唐文也。碑旨言：安南靜海軍地皆濱海，海有三險，巨石屹立，鯨波觸之，晝夜震洶。漕運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為風引，遵崖而行，必瓦碎於三險之下。而陸有川遙，頑石梗斷焉。伏波嘗加功力，迄不克就。厥後守臣屢欲開鑿，以便漕運。錐鑿一下，火光煜然。高駢節度安南，齋戒禱祠，將施功焉。一夕大雨，震電於石所者累日，人自分淪沒矣。既霽，則頑石破碎，水深丈餘。旁有一石猶存，未可通舟。駢又虔禱，俄復大雨震電，悉碎餘石，遂成巨川。自是舟運無艱，名之曰天威遙。退而求諸傳，載天威遙事略同，但不若是詳爾。<sup>27</sup>

<sup>25</sup> 參見李燾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二七一、二七二；脫脫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三三二，〈趙鼎傳〉。

<sup>26</sup> 張栻撰，朱熹編，《南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7冊），卷九，〈欽州學記〉，頁501；楊武泉，〈周去非與《嶺外代答》——校注者前言〉，見《嶺外代答校注》，頁2-4。

<sup>27</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一，頁33。

周去非強調當時欽州人曾果所得《天威遙碑》「誠唐文也」，據此可以推斷，原立在「天威遙」原址的唐《天威遙碑》，至南宋時已經被欽州人曾果所收藏。而《安南志略》、《越嶠書》和《全唐文》所收《天威經新鑿海派碑》，與周去非親自看到並記載的《天威遙碑》，應源出於同一種版本。<sup>28</sup>

王象之的《輿地紀勝》大致成書於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在有關邕州碑記中著錄有《天威經新鑿海派》碑。<sup>29</sup> 其《輿地碑記目》卷三〈邕州碑記〉也有著錄。顯然，以上均是指宋哲宗紹聖年間重刻於邕州政事大廳的《天威遙碑》。《全唐文》所收《天威遙碑》應抄錄自嘉慶年間尚在流傳的文獻。<sup>30</sup> 至清朝道光二年（1822），由阮元主持編纂的《廣東通志》正式刊刻。該書之〈金石略〉通過抄錄各種前代文獻，也收入了不少道光年間已「佚」的石刻碑銘。然而，對於已「佚」的唐《天威遙碑》，阮元則僅著錄碑名。雖然阮元本人也是負責《全唐文》編纂的最主要學者之一，但他不從《全唐文》等文獻中彙錄，而是完整地徵引了《嶺外代答》的考證內容，說明他考慮到了各種傳世文本之間的差異。不過，我們認為，流傳至今的《天威遙碑》幾種錄文之間即使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其內容的可靠性及其史料價值仍是無庸置疑的。

## 貳・關於唐朝「天威遙」的名稱和確切地點

歷史上「天威遙」還有多種不同的名稱。《新唐書·高駢傳》和宋代王應麟所編《玉海》均作「天威道」。<sup>31</sup> 宋代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清康熙年間汪森

<sup>28</sup> 也有學者根據《全唐文》的錄文中沒有周去非所提到的「海有三險」，加上「文非駢驪」，認為該碑「必非曾果、周去非所見之文」；見《嶺外代答校注》卷一，頁34。不過，在《安南志略》和《越嶠書》的版本中，即專門有「凡涉交趾，履險之處，其處三焉」，並列舉了「三險」的具體名稱。且現存這篇碑文也是典型的駢體文。

<sup>29</sup> 王象之，《輿地紀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85冊），卷一〇六，〈邕州·碑記〉，頁59。

<sup>30</sup> 按著錄碑名的有：康熙年間編成《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錄》卷六三著錄有《天威經新鑿海派碑》；康熙年間汪森《粵西叢載》卷一之〈邕州碑記〉有《天威經新鑿海派》；雍正年間金鉉《廣西通志》卷四五〈古跡·南寧府〉著錄《天威經新鑿海派》。不過以上均只錄碑名而未輯錄碑文。見《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1冊），頁792；《粵西叢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67冊），頁347；《廣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6冊），頁320。

<sup>31</sup> 王應麟編，《玉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7冊），卷一七四，〈宮室·唐安南城〉，頁499。

的《粵西叢載》、雍正《廣西通志》等等作「天威經」。《安南志略》和《全唐文》的錄文作「天威徑」。然而《越嶠書》的錄文，包括一四六一年完成的《明一統志》、一六一七年成書的張燮《東西洋考》、<sup>32</sup> 明代《廣輿記》、《越史略》，還有顧祖禹 (1631-1692) 的《讀史方輿紀要》、一七六四年的嘉慶《大清一統志》、清代徐延旭《越南山川略》等等，均作「天威涇」。由於僅有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稱「天威遙」，因此有學者推斷「天威遙」一名屬於錯誤。<sup>33</sup>

我們認為之所以出現如此眾多的不同名稱，可能與唐、宋時代嶺南西南部方言有關。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有專門的「方言」和「俗字」條，均反映唐、宋時代廣西方言和俗字相當普遍。《嶺外代答》卷一〈天分遙〉稱：「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為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七十二遙中，有水分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遙。」<sup>34</sup> 阮元根據周去非的記載，認為「天威遙」之外的其他所有名稱均誤，其文曰：

碑云「名之曰天威遙」。《新書·高駢傳》云「鑿徑道五所，因名道曰天威」，而《舊書》、《通鑒》但載鑿海路潛石事，《北夢瑣言》又稱駢奏開本州海路，並不言鑿徑道五所，則《新書》誤也。碑云「陸有川遙」，《嶺外代答》：「南人謂水一折為遙。」蓋方俗語，歐、宋不解，以字形相近，乃臆改為「道」爾。<sup>35</sup>

據此，高駢開鑿的地點確實稱為「天威遙」。由於「遙」是唐、宋時代嶺南西南部尤其是欽州一帶的方言，這種人工開鑿的運河「天威遙」即代表「水一折」。

<sup>32</sup> 《明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卷九〇，〈安南〉，頁889；張燮，《東西洋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4冊），卷一，〈西洋列國考·交趾·形勝名跡〉，「天威涇」條，頁147。

<sup>33</sup> 參見《嶺外代答校注》卷一，頁34, 35。《越南山川略》記載：「天威涇，自交州至邕州，海多潛石，運道不通。唐高駢鑿開五涇，涇有青石不可治，既而雷震碎其石，涇始通，因名天威涇，涇亦作港。」徐延旭，《越南山川略》（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杭州：杭州古籍書店影行，1985〕，第12冊）；陸應陽，《廣輿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3冊）；《越史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6冊），卷上，頁569；顧祖禹撰，賀次君、施金和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嘉慶）《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3冊），卷四二二，〈安南〉，頁693。

<sup>34</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一，頁35。

<sup>35</sup> 《廣東通志金石略》，頁112。

而後來的北方內地士人對此並不瞭解，所以才出現了各種不同說法。至於「天威遙」之所以號稱「天威」，前引宋人《天威遙碑》「跋文」稱「皇名天威」，說明「天威」之名可能為唐懿宗所題。

關於歷史上「天威遙」的確切地點，中外歷史資料記載歧異較大。越南阮朝嘉隆（1802-1819）年間所編《皇越一統輿地志》和一八八六年越南官方所編《同慶地輿志》，均記載「天威港」在越南中部乂安省興元地區，而其敘述則都依據了唐朝裴鏘的《天威遙碑》。<sup>36</sup> 然而，一八八四年由越南阮朝所編《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稱：

舊史云駢巡視邕、廣，疏海路，名曰天威港。考之唐《地理志》，博白縣有北戍灘，咸通中高駢募人平險石，以通舟楫。《清一統志》博白縣今屬鬱林州，高駢所鑿非我國界。或謂乂安鐵港，一名天威港，非也。舊史所載，恐未是。<sup>37</sup>

《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的作者徵引中國典籍文獻，意在證明「天威遙」的地點在今廣西博白縣境內。中國大陸也有學者認為高駢開鑿的「天威遙」其位置「在合浦附近的博白沿海」。<sup>38</sup>

高駢在今廣西博白縣境內開鑿的「北戍灘」與歷史上的「天威遙」，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容州都督府所轄的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有北戍灘，咸通中，安南都護高駢募人平其險石，以通舟楫」。<sup>39</sup>《輿地紀勝》稱：「北戍灘，在博白縣，昔高駢平蠻，取海道由合浦而歸，見其湍險，囑防遏使疏治之，人賴其利」。<sup>40</sup>《輿地碑記目》著錄有《唐乾符中碑》，稱：「北戍灘在博白縣西南一百里馬門灘之下。唐咸通末，都護高駢平蠻獠，詔歸闕，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經是灘，險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駢因留俸錢，遺海門防遏使揚俊營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無難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紀其事。碑今存焉。」<sup>41</sup> 不過，「北戍灘」與「天威遙」兩處工程又是有聯繫的，

<sup>36</sup> 《皇越一統輿地志》（巴黎：法國亞洲學會藏本），卷九，〈乂安省·名勝〉，頁44；《同慶地輿志》（河內：世界出版社，2003），〈乂安省〉，頁1289。

<sup>37</sup> 潘清簡、范春桂等纂修，《欽定越史通鑒綱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1969），卷五，頁396-397。

<sup>38</sup> 見馮漢鏞，〈宋代國內海道考〉，《文史》26（1986）：145。

<sup>39</sup> 《新唐書》卷四三上，〈地理志〉，頁1109。

<sup>40</sup> 《輿地紀勝》卷一二〇，〈廉州·景物下〉，頁120。

<sup>41</sup> 《輿地碑記目》卷三，〈鬱林州碑記〉，頁557。

正如漢學家薛愛華 (Edward H. Schafer) 所指出的，在鄰近雷州半島的容管白州，高駢所進行的疏浚河道工程，與他開闢的直通紅河河口和安南首府的水上通道直接相關。<sup>42</sup>

廣西博白縣境內還有東漢馬援開鑿過的「馬門灘」。<sup>43</sup> 清初《讀史方輿紀要》將這三地的差別作了清楚的說明：首先記載廣西博白縣境內有「北戍灘」和「馬門灘」，然後又記載了境外的「天威涇」，稱「自廣東欽州而西南，歷烏雷山以至南境之大長海口，其可入之支港以數十計。馬援討徵側緣海而進，高駢復安南亦自海道而前。今有天威涇，駢所鑿也」。又徵引了《新唐書》關於高駢開鑿「天威涇」的記載。<sup>44</sup> 前引北宋邕州政事大廳所刻《天威遙碑》的宋人跋文明確稱：「震師巨石，勒功徑上，皇名『天威』。下迨昭、僖，中原多故，逐（遂）置疆場之外。」說明在唐末五代十國時期，「天威遙」一帶曾經處在已實際獨立的安南政權控制之下。然而，明清時期的《明一統志》、《廣輿記》、《東西洋考》、《越嶠書》卷一、（嘉慶）《大清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等等，都是把「天威涇」作為中國疆域之外安南國的山川形勝來敘述的。<sup>45</sup>

按晚唐高駢開鑿的「天威遙」，實際上位於今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江山區所在的江山半島上。早在南朝梁武帝大同（535-546）年間，即在此設置有黃州，治所在安平縣（今廣西防城港市西南東興市東南），其轄境相當於今廣西防城港市、欽州市部分地區及越南芒街一帶。隋開皇十八年（598）改為陸州，「以在海南，有陸路通海北，因以為名。州在窮海」。<sup>46</sup> 隋煬帝大業初廢。唐武德四年（621）置玉州，治所在安海縣（今越南芒街東南玉山）。貞觀二年（628）廢。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復置，改為陸州，領烏雷、華清、寧海三縣，治所在烏雷縣（今廣西欽州市東南烏雷村）。而江山半島一帶屬於寧海縣。唐初陸州屬於交州都督府管轄。至唐高宗調露元年（679）後，交州都督府改稱安南都護府。

<sup>42</sup> Edward H. 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32.

<sup>43</sup> 王存等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附錄，《新定九域志》卷九，頁705。

<sup>44</sup>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二，〈廣西七·外國附考·交州府〉，頁4996。

<sup>45</sup> 《明一統志》卷九〇，〈安南〉，頁889；《廣輿記》卷二四，〈外譯·安南國〉，頁497；（嘉慶）《大清一統志》卷四二二，〈安南〉，頁693。

<sup>46</sup>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三八，頁962。

至北宋開寶（968-976）年間，由於原唐朝陸州管轄之地已分屬於宋朝和已獨立的安南王朝，宋朝因而正式廢除陸州。在宋朝境內的原陸州之地則改屬於欽州。元代，今防城一帶屬於欽州路。明初則屬於廣東欽州府，後改欽州。因此，自宋代以來，「天威遙」所在的防城一帶主要屬於欽州管轄。<sup>47</sup> 明、清兩代典籍都沒有將「天威遙」列入欽州敘述，而是錯誤地將其歸於中國疆域之外。其原因是早在明代以前，「天威遙」運河工程已經被徹底廢棄了，所以，一般學者已不瞭解唐朝「天威遙」的確切位置。

江山半島是廣西最大的半島，因其形狀似龍，所以當地又稱為白龍半島。顧炎武等即記載了通往安南水路所經過的白龍半島頂端的「白龍尾」。<sup>48</sup> 江山半島面積六十三平方公里，海岸線共三十二公里。半島上大多是連綿的丘陵山地，平地很少。今半島上尚有「潭蓬古運河」，位於江山半島北部月亮灣附近的潭蓬村和潭西村之間，又稱「天威遙」、「仙人壟」。因為這條運河所經之處仙人壟全是海石結構的丘陵地帶，工程異常艱巨浩大，人們認為只有神仙才能完成這樣的壯舉，因而在當地又被稱為「仙人壟」。

為了更真切地瞭解唐代「天威遙」運河工程的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二〇〇八年十月初，我曾經專程前往江山半島一帶考察。由於「天威遙」運河工程已經廢棄達數百年之久，其遺跡大多已湮沒在荒山榛莽和亂石溝壑中。這條運河原長應為五公里左右。而現存運河的大部分已於一九三四、五七年分別築成兩座水庫以灌溉農田，其長約一點六公里，頂寬約二十五公尺，底寬約七公尺，平均深約十公尺，而底部和兩側多為沙岩。從運河工程遺跡的走向來看，當年的建造者應盡可能地利用了山嶺之間的谷地和一些地勢較低的平地。而工程最主要的困難，還是必須要鑿通多處地勢頗高的山峪。

新、舊《唐書》等不少資料將這一工程記載為開鑿海中的「巨石」，而《資治通鑑》、《北夢瑣言》等文獻典籍則記載為開鑿「潛石」或「隱石」，意即海面之下的巨大礁石。以上這些記載都是不確切的。因為古代工程技術等條件，也決定了不可能在海水中或海面下完成這樣巨大的工程。所謂「天威遙」就是在伸

<sup>47</sup> 根據《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明初設置有防城營作為欽州西南邊的門戶，在「州南二百里」。明永樂十四年（1416），設置有管理海上通航的「防城水驛」；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一〇四，〈廣東五·欽州〉，頁4761。清朝乾隆十二年（1747），於此設防城巡司，屬於廣東欽州。至光緒十四年（1888）改為防城縣。

<sup>48</sup>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廣文書局，1979），卷一一八，〈安南〉，頁8308。

入北部灣的江山半島上，開鑿出一條橫貫半島的人工運河，以溝通和連接江山半島南部的珍珠灣和北部的月亮灣。這條運河鑿通後，不僅使海上航程縮短了十五公里，而特別重要的是，可以使海上航行的船舶能夠避開半島頂端白龍尾一帶的礁石險灘和颶風巨浪的搏擊。現在古運河中部西南段的石壁上仍留有許多石刻文字，然經過一千多年的風雨侵蝕，大多已模糊不清。目前尚能辨別的摩崖刻字尚有「元和三年」、「湖南軍，咸通九年三月十三日下手」等字樣。「天威遙」作為中國古代唯一的一條海上運河，一九八二年已被正式確定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重點文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學術界至今尚未見有專門的研究。

公元一四七九年成書的越南《大越史記全書》，主要依據唐《天威遙碑》記載了高駢開鑿「天威遙」的過程，並稱：「港乃成，因名天威港。」<sup>49</sup> 可見，自晚唐至《大越史記全書》撰成的十五世紀，「天威遙」一帶曾經是海上交通貿易的港口。然而作為海上運河的「天威遙」本身，則在歷史上已經逐步廢棄了。至於廢棄的原因，有人認為與宋代以來中越邊境較多的戰爭有關。我們認為，除此之外，可能還與宋代以來航海技術的發展有關。因為唐朝開鑿「天威遙」的直接原因，是使海上船舶避開江山半島附近的礁石和颶風巨浪。而宋代以後造船技術發展，海上船舶一般較能夠抗擊海上巨浪，因此不再需要經過「天威遙」而行。從現存很多遺跡仍能發現古代這一工程的異常艱巨和宏偉壯觀。值得我們深究的是，唐朝為什麼要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這裏開鑿大規模的海上運河工程？

### 叁·漢唐安南海上通道狀況與高駢開鑿「天威遙」的背景

#### 一·漢唐時期通往安南海上通道的狀況

從安南與中原內地的陸路交通情況來看，至唐代主要有兩條通道，一條是自安南的交趾經由紅水河從雲南到達成都，然後由成都輾轉抵達長安。<sup>50</sup> 這條通道

<sup>49</sup> 吳士連撰，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4），外紀，卷五，頁168。

<sup>50</sup> 參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圖十七「唐代蜀江以南川黔滇越交通圖」，頁1335。

早在漢代就已經存在。一條是在唐太宗貞觀年間，已經開通了由邕州（今南寧）經過今中越邊境憑祥市友誼關到達安南交趾的通道。<sup>51</sup> 不過，這兩條陸上通道沿途都要大量穿越崇山峻嶺，道路崎嶇。特別是經由雲南的道路，路途十分遙遠。在中唐以後，南詔已經發展成強大的地方政權，因而在多數時間都阻隔了長安與安南兩地的交通。在交通尚不發達的古代，通往安南的陸路交通狀況，決定了其運量和速度都相當有限，運輸成本也必然很高。通往安南的沿海航道則具有明顯的優勢，不僅在於運輸規模大，成本較低，而且還在於運輸速度的快捷。因此自秦漢直至隋唐，中央王朝與安南地區之間頻繁而大規模的人員往來、軍隊的調遣、貨物的運輸，都極大地依賴海上航運通道。

然而，裴鉞《天威遙碑》開篇即描述了安南海上通道艱險而又驚心動魄的情形：「巨浸無涯，接天茫茫。狂飆捲蹙，駭浪屹起。若流〔玉〕堆而走雪岫，瞬息萬里皚皚然。縱天英〔吳〕之神威，亦不能抑遏其勢。長鯨憂其蹭蹬，巨鼇困其擺闔。水族之偉者尚不得安，況橫越之舳艫，焉能利涉耶？即摧檣裂帆，覆溺而不可拯。」因此，安南海上通道的艱險又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安南與中國內地的正常交通。漢唐時代，沿著「瘴江」即今廣西南流江至合浦附近的入海口，再越海前往安南是通往安南的最重要通道。唐代張均的詩反映了這條海路的危險性：「瘴江西去火爲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sup>52</sup>

根據裴鉞《天威遙碑》記載，海上航行最主要的危險是颶風和巨浪。唐人對南海的颶風多有記載。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載：「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霓，名曰颶母。」晚唐劉恂《嶺表錄異》稱：「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見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sup>53</sup> 韓愈於元和十四年（819）貶任潮州刺史，其到達廣州後是經由海上到達潮州的。他在給唐憲宗的上書中稱，潮州「去廣府雖才二千里，然往來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sup>54</sup>

<sup>51</sup>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頁6148，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六月稱：「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

<sup>52</sup> 《輿地紀勝》卷一二〇，〈廉州·詩〉引〈唐紀事詩〉，頁117。按此詩《全唐詩》未收。

<sup>53</sup> 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太平廣記》卷三九四，〈雷二·南海〉引《嶺表錄異》，頁3149。

<sup>54</sup> 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全唐文》卷五四八，頁5554。

變化莫測的氣候使航海者在浩瀚的大海上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東漢末年，許靖在給曹操的信中敘述了其前往交州的經歷，「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sup>55</sup> 宋代人稱，「炎荒之極，南海在望。洪濤瀾漫，萬里無際，風濤洶湧」。<sup>56</sup>「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海道」；「鯨波浩渺，實為危道。非神力助順，豈能必濟！」<sup>57</sup> 周去非即明確記載，從廣西欽州和廉州通往安南的海路，「亂流之際，風濤多惡」。<sup>58</sup> 唐憲宗元和（806-820）初年，元微、柳實二人從內地至於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夜將午，俄颶風欵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髻，搶巨鼉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而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sup>59</sup>

唐德宗貞元（785-805）年間，賈耽所撰《海內華夷圖》證明從廣州出發，經海南島東部橫越南海的深海航線即「廣州通海夷道」已經開通。<sup>60</sup> 不過，廣州至東南亞等地的海上航線，在相當長時期仍以沿海航道為主。唐德宗貞元年間，安南交趾的海外貿易一度超過廣州就是明證。<sup>61</sup> 其原因在於沿北部灣海岸航行，雖然道程迂遠，但是其優越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其續航條件更為突出，船舶物資包括淡水的補充更為容易，也更容易辨認方向。其次是沿海航行相對容易靠岸以規避海上狂風巨浪。從宋代開始，一方面因為安南已經獨立，另一方面則因為海上船舶規模的日益增大，加上包括指南針等航海技術的進步，船舶越來越多地放洋橫越南海，並最終導致了中國沿海主要對外貿易口岸逐漸北移。

除了颶風巨浪之外，古代北部灣沿海航道還有幾種在今天可能為人們所忽略的危險。首先，是海中遊弋的鯨魚給航行的船舶帶來了很大的危險。《天威遙碑》所稱「長鯨憂其蹭蹬」，長鯨就是鯨魚。唐朝北部灣一帶鯨魚的活動相當頻

<sup>55</sup>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三八，〈許靖傳〉，頁964。

<sup>56</sup> 宋太祖開寶六年（973）裴麗澤奉敕撰《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銘》；見《廣東通志金石略》，頁139。

<sup>57</sup> 真德秀，《西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卷五四，〈聖妃祝文〉，頁863；〈海神祝文〉，頁858。

<sup>58</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一，「欽廉溪峒都巡檢使」條，頁53。

<sup>59</sup> 《太平廣記》卷二五，〈神仙·元柳二公〉引《續仙傳》，頁166-167。

<sup>60</sup>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頁1153。

<sup>61</sup> 《資治通鑑》卷二三四，頁7532，記貞元八年（792）六月，「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陸贄，〈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稱：「嶺南節度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貿易，進奉事大」；見《全唐文》卷四七三。

繁。北宋初樂史撰《太平寰宇記》記載：「南海，側海寓連雲，多鯨鯢，其大吞舟，大者數千里，小者亦千里，去海門猶一二望，漁人往往見之。」<sup>62</sup>「海門」是指唐代後期在合浦附近興起的軍事重鎮海門鎮，是跨越海道前往安南的起點。《太平寰宇記》引《嶺表錄》云：「交趾回人多捨舟，取雷州陸岸而歸，不憚辛苦。蓋避海鰩之患也。」<sup>63</sup>按《嶺表錄》又名《嶺表錄異》或《嶺表異錄》，為晚唐廣州司馬劉恂所撰。《太平廣記》等所引《嶺表錄異》「海鰩」條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

海鰩，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也。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經調黎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也，深闊處，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山，海鰩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鬚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際，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鰩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兩耳。」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沒去。魚畏鼓，物類相伏耳。交趾迴，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不憚苦辛，蓋避海鰩之難也。乃靜思曰：設使老鰩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簪井耳，寧得不為人皓首乎！<sup>64</sup>

這條記載反映了廣州與安南之間透過沿海通道有相當頻繁的貿易往來，然而鯨魚所造成的危險則也觸目驚心。所謂「交趾迴，乃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則說明從安南的交趾到雷州半島的北部灣沿海鯨魚的危險更加嚴重。唐朝眾多的詩人也留下了描述南海鯨魚的詩句。<sup>65</sup>總之，唐人為數眾多而又充滿想像的記載，一

<sup>62</sup>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一六〇，〈嶺南道四·潯州〉，頁3068。

<sup>63</sup> 《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雷州海康郡〉引《嶺表錄》，頁3230。

<sup>64</sup> 《太平廣記》卷四六四，「海鰩」條引《嶺表錄異》，頁3820；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九三八，頁4168，「海鰩魚」條引《嶺表錄異》與此略異。

<sup>65</sup> 其中有代表性的如：楊衡，〈送王秀才往安南〉：「君為蹈海客，客路誰諳悉。鯨度乍疑山，雞鳴先見日」；見《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四六五，頁5283。劉禹錫，〈酬南海馬大人〉：「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見《全唐詩》卷三六一，頁4075。元稹，〈送嶺南崔侍御〉稱：「蜃吐朝光樓隱隱，鼉吹細浪雨霏霏」；見《全唐詩》卷四一二，頁4572。元稹，〈和樂天送客遊嶺南二十韻〉：「歌鐘排象背，炊爨上魚身夷民大陳設，則巨象背上作樂，大魚出浮，身若洲島，海人船舟於旁，因而炊爨其上，魚之不覺，電白雷山接，旗紅賊艦新」；見《全唐詩》卷四〇七，頁4533。

方面是當時南海海洋生態狀況的反映，同時也說明了鯨魚的危險在南海航行中的普遍性。

其次，是沿海航道海底磁石對船舶的威脅。從廣州到安南以及南海諸國的近海航道，沿途要經過不少接近陸地的地方，特別是一些由陸地伸入海上的岬角地點。這些岬角之所以能伸入海中，就是因為岬角是由堅硬的岩石所成，如石英岩、石英砂岩、火山岩等。如果這些岩石含有大量磁鐵礦，就會成為來往船隻的障礙。船舶上的鐵釘、鐵葉、鐵板、鐵碇、鐵鏈等鐵器都可能被強大的磁力吸附，其結果就是導致船舶進退兩難甚至解體。<sup>66</sup>《嶺外代答》記載了廣西沿海航線因有海底「磁石山」，以致「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船皆空板穿藤約束而成。於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幹而窒之，遇水則漲，舟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sup>67</sup>可見，宋代廣西水師和商賈的船舶大多不用鐵釘，最主要原因就是為了規避海底的「磁石山」。而早期的東西方文獻都記載了馬來半島地峽西邊海中有磁石，例如比《嶺外代答》早九百年左右的萬震《南州異物志》，即提到了海中存在磁石之事，其文曰：「句稚去典遊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sup>68</sup>該書又稱：「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鐵鑠鑠之。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sup>69</sup>《南州異物志》、《隋書·經籍志》著錄，稱「吳丹陽太守萬震撰」。公元二世紀托勒密《地理志》記載，馬尼奧萊群島有十個相互毗連的島嶼，「裝有鐵釘的船隻都要被吸住難行，也許是由於島嶼中大磁石的緣故」。<sup>70</sup>公元四世紀聖·安布盧瓦茲的著作和四、五世紀之間的巴拉迪尤斯在《論婆羅門教》一書中也有相同的記載。<sup>71</sup>

前引晚唐《嶺表錄異》所稱每年「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就是因為以銅代鐵，才可以在磯頭、岬角及遇上磁鐵礦區或含磁鐵礦岩石地區時，不受磁力影響，使海船能航行自如。古代南越人善於用舟，很早就能製造航海的大

<sup>66</sup> 參見曾昭璇，《嶺南史地與民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頁87。

<sup>67</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六，頁218。

<sup>68</sup> 《太平御覽》卷七九〇，「句稚國」條引《南州異物志》，頁3501。

<sup>69</sup> 同前書，卷九八八，「磁石」條引《南州異物志》，頁4372。

<sup>70</sup> 魏徵等編，《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三三，〈經籍志二〉，頁983；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44。

<sup>71</sup> 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頁74, 75。

船。<sup>72</sup> 嶺南沿海「銅船」的使用大致就開始於秦漢時代的越人。東晉人劉欣期《交州記》稱：「越人鑄銅爲船，在江潮退時見。」<sup>73</sup> 東晉《林邑記》一書稱葉榆河自羸婁縣東逕安定縣，「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見之者」。<sup>74</sup> 可能早在秦末南越王趙佗攻滅交趾一帶的安陽王時，即已製作銅船。

最後，是通往安南的近海航道上還分佈有大量的暗礁險灘。《嶺外代答》記載海上「舶商」稱：「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欽、廉而西，則尤難行。」該書又記載，欽州、廉州海面交界處有「象鼻砂」，「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隱在波中，深不數尺，海舶遇之輒碎。去岸數里，其磧乃闊數丈，以通風帆。不然，欽殆不得而水運矣」。「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爲難行，觀欽之象鼻，其端倪已見矣」。<sup>75</sup>

而在通往安南的所有海上暗礁險灘中，可能以「天威遙」所在的江山半島一帶最具有危險性。前引《嶺外代答》根據裴鏘《天威遙碑》稱：「安南靜海軍地皆濱海，海有三險，巨石屹立，鯨波觸之，晝夜震洶。漕運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爲風引，遵崖而行，必瓦碎於三險之下。而陸有川遙，頑石梗斷焉。」所謂「漕運之舟」，即唐朝國家海上運輸的船隊。而周去非所提到的「海有三險」，在裴鏘《天威遙碑》中的原文表述爲：

凡涉交趾，履險之處，〔其處三焉〕，昔如覆冰。宋洞沙之鋒觜，耕其淪漣；女漚灣之石頭（角），湧其沸騰；大蒙神之山腳，蹴其洶湧。舟人所歷，毛髮自寒。

由於《全唐文》的錄文闕漏了「其處三焉」這句話，以致後面的多處文句難以解讀。所謂「三險」，一是指宋洞沙之鋒觜，以其「淪漣」即波浪和旋渦著稱；二是指女漚灣之石角，即從陸地延伸至海水中的礁石，以其巨浪翻滾咆哮著稱；三是大蒙神山腳下，以其潮水狂野洶湧著稱。《天威遙碑》稱：「渡危走食，冒險駕航。脫兔者稀，傾沈是當（常）。」而這「三險」都應集中在江山半島頂端的

<sup>72</sup> 參見沈福偉，〈兩漢三國時期的印度洋航業〉，《文史》26（1986）：46。

<sup>73</sup>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郡國志·交趾郡〉注引《交州記》，頁3532。

<sup>74</sup> 鄭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三七，「葉榆河」引《林邑記》，頁862。

<sup>75</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一，頁37-38。

白龍尾一帶。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三月，高駢在給唐懿宗的上奏中，形容這一帶的艱險曰：「人牽財利，石限衡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sup>76</sup>《北夢瑣言》記載高駢開鑿「天威遙」是因「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sup>77</sup>

二〇〇八年十月初，我曾親臨江山半島的最頂端考察，試圖更直接地瞭解歷史上「天威遙」開鑿的緣由。江山半島猶如一隻碩長的牛角深深插入北部灣中，而深海潮汐、洋流和風浪與這種特殊的地形相遇，必然造成這一帶海面晝夜常有驚濤駭浪。江山半島的白龍尾總寬約二點五公里。而其北部屬於白龍尾的最頂端，寬約一公里。在這裏，南北兩端各有一排巨型的礁石凸出，而且從陸地一直綿延至深海中。其中間則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弧形缺口。靠近北端的一排礁石則連接著陸地上的一座石山，大概就是裴鏞《天威遙碑》所說的「大蒙神山」，現在稱為燈架嶺，上面建有指示海上航向的燈塔。嶺下海灘上則是大片猙獰怪異的巨大礁石，又稱「怪石灘」。礁石嶙峋高聳，堅硬如鐵，鋒利如斧，因海浪千百萬年的沖刷而形成的海蝕地貌呈褐紅色，因此又稱「海上赤壁」。稍稍起風就可見「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壯觀場面。而周圍方圓十多公里大片水域的海面下還潛伏著無數的暗礁，更增加了這一帶航行的兇險。因此，負責唐朝漕運的船舶和其他各種海舶，經過這一帶必須盡可能地駛入深海繞道而行。《天威遙碑》所稱「即摧檣裂帆，覆溺而不可拯」，說明如果船舶被海風牽引吹向礁石灘或崖壁，船體很可能就徹底瓦解覆沒。

江山半島背靠著西南東北走向的十萬大山。而廣西欽州以西的沿海地區絕大部分都是丘陵山地，雖海拔不高，但極難通行。至於陸地上的河流也因為「頑石梗斷」而難通航。只有親自到過廣西南部，才能瞭解古代前往安南為什麼如此倚重海上航行。只有到過江山半島的白龍尾，才能瞭解古代海上航運在這一帶是多麼兇險艱難，也才能瞭解古代為什麼會花如此巨大而罕見的人力和物力，去開鑿一條貫通江山半島的人工運河。

<sup>76</sup>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六七八，〈牧守部·興利〉，頁8103。

<sup>77</sup> 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二，頁36。

## 二・漢唐時期「馬援故道」及高駢以前「天威遙」的幾次開鑿

至於晚唐高駢開鑿「天威遙」的直接原因，裴鏘《天威遙碑》稱：「自僕射渤海公剪蕩蠻夷，跨逾滄漲，削平交趾，克服郡城，錯磨鋌刃，駐蹕卒伍。然運粟走食，尚阻洪濤，召術徵謀，未閱長策。渤海公曰：我再有丹徼，重闡皇風，聚兵安人，須便於事。」所謂「聚兵安人」和「重闡皇風」，即在唐朝重新恢復對安南的統治後，需要調遣軍隊，安撫民眾，運輸軍糧。碑文首先揭示了這條通道所具有的重要軍事價值和戰略意義。然而，碑文也揭示了江山半島一帶作為通往安南海上航道的最大威脅，中央王朝開鑿「天威遙」運河並非始於晚唐的高駢。高駢實際上是繼續並最終完成了前人未竟的事業。而且高駢是把東漢初期的馬援作為自己效法的對象。

碑文追溯了馬援開鑿「天威遙」的首創之功：「自東漢馬伏波欲剪二徼，將圖交趾，煎熬饋運，間闊滄溟，乃鑿石穿山，遠避海路。」東漢建武十六年(40)，交趾徵側、徵貳自立為王。光武帝派軍征討，詔令長沙、合浦、交趾等地「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蹊，儲糧穀」。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前往征討。<sup>78</sup> 馬援率軍抵達今廣西合浦後，《後漢書》記載「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sup>79</sup> 即從合浦附近的出海口出發，經過今欽州、防城一帶，渡過北侖河進入今越南境內，並開闢了一條從合浦到浪泊（今越南北寧省境內）長達一千多里的沿海交通線。

至於《後漢書》所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馬伯樂 (Henry Maspero) 認為馬援之行：

可能沿著路博德從廣西到廣東的老路，到達合浦或現今廉州府附近。這是前往東京的上船港口，段志帶給他的兩千艘帆船的船隊停泊在此。但是大船在數量上是不夠的；段志到達合浦時發病身亡。馬援決定帶領他的軍隊由陸路進發。他出發穿越不出名且帶有敵意的烏潯領地，此地由山嶽和叢林所覆蓋，必須費力地開闢道路。沿海岸而行，這是為了與補充軍需的船隊保持聯繫……<sup>80</sup>

<sup>78</sup>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頁2836。

<sup>79</sup> 同前書，卷二四，〈馬援列傳〉，頁838。

<sup>80</sup> Henry Maspero, "L'expédition de Ma Yua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8.3 (1918): 14-15.

不過，我們認為，由於今欽州西南的沿海分佈如此眾多難以逾越的丘陵山地，以馬援有限的軍力和緊迫的軍情，顯然無法開鑿出一條可用於行軍的沿海陸地通道。而且兩千艘帆船承載兩萬人的軍隊本身也還是可行的。因此，馬援率軍從合浦到達交趾，應主要是依賴海上航運。

《後漢書》似乎並未直接記載馬援開鑿「天威遙」運河之事。《新唐書·高駢傳》也稱「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有研究者據此「或傳」一詞，懷疑裴鏞《天威遙碑》中馬援開鑿「天威遙」事蹟的真實性。<sup>81</sup> 我們認為，《天威遙碑》有關馬援開鑿「天威遙」海上運河的記載具有可信性。根據《後漢書》的記載，馬援於建武十八年（42）春率軍至浪泊上，與徵側等戰。接著馬援又「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於今為盛。」<sup>82</sup> 可見，馬援南征交趾是以水軍和樓船為主。

從六朝以來的不少文獻都記載了馬援在交趾以南的九真郡開鑿有「南塘」或稱「鑿山」和「鑿口」海上工程，以使海上航行的船舶在此可以避開漲海。<sup>83</sup> 而《舊唐書》則稱馬援「自交趾循海隅，開側道以避海」。<sup>84</sup> 《太平寰宇記》記載為「開側道以避海難」。由於今江山半島一帶已經很接近於漢代交趾郡的範圍，因此，我們認為這些記載其實都與馬援在江山半島「天威遙」一帶的開鑿有關。一方面，馬伯樂的研究已經證明了在今天越南河內以南即原九真郡境內的「鑿口」（今稱神投）一帶，既不需要也沒有發現古代大規模工程的遺跡。<sup>85</sup> 另一方面，

<sup>81</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一，頁35。

<sup>82</sup> 《水經注校證》卷三七，「葉榆河」，頁862。

<sup>83</sup> 東晉時劉欣期所撰《交州記》記載：「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去州五百里焉。（馬）援積石為塘，以通於海」；見《太平御覽》卷七四，「塘」條引。《太平寰宇記》記載愛州軍寧縣有「鑿口」，並引東晉成書的《廣州記》為：「馬援鑿九真山，即石為隄，以遏海波。自是不復過海漲」；見《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一，〈嶺南道十五·愛州〉引《廣州記》。晉宋之際的沈懷遠所撰《南越志》稱：「馬援鑿通九真山，又積石為坻，以遏海波，由是不復過漲海」；見徐堅等編，《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八，〈嶺南道〉引《南越志》。《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八，〈嶺南道·愛州〉稱愛州日南縣有「鑿山」，在縣北一百三十里，「昔馬援征林邑，阻風波，乃鑿此山彎為通道，因以為名」。

<sup>84</sup>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一，〈地理志四·嶺南道·驩州〉，頁1755。

<sup>85</sup> Maspero, "L'expédition de Ma Yuan," p. 22.

從合浦通往交趾的海上航道以江山半島一帶最危險。史書所記載的馬援因「阻風波，乃鑿此山彎爲通道」，「以遏海波，由是不復過漲海」，「開側道以避海」等等，均與《天威遙碑》所稱馬援「鑿石穿山，遠避海路」相同。今「天威遙」遺跡確實穿越了不少山地。特別是這一工程的目的，本身就是爲了避開半島頂端海面上的颶風巨浪。

根據裴鏞《天威遙碑》的記載，馬援開鑿「天威遙」所遇到的最大障礙，是運河所經過之地，「多爲霆震山之巨石，自巔而咽之。伏波無術，不能禁，乃甘其息」，雖然「死役者不啻萬輩」，但是「竟不遂其志」。因此，從漢代以來各種關於馬援開鑿海道的記載，可能實際上是一件沒有真正完成的大型運河工程。然而，由馬援開闢的以合浦附近爲起點前往交趾的這條海上通道，在其後很長時期都具有極爲重要的軍事意義，歷史上又稱爲「馬援古道」、「馬援故道」，或「伏波故道」。顧炎武稱：「馬伏波以來，水軍皆由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交州潮陽鎮」。<sup>86</sup> 從東漢馬援開始，廣西合浦一帶即成爲控馭安南的軍事戰略要地。這一帶長期都有祭祀馬援的烏雷廟。<sup>87</sup>

《天威遙碑》又記載：「自唐皇（皇唐）有三都護，〔聆〕其舊跡，俱〔扼腕忿禁〕，〔盡〕欲繼其事。遂命疊燎沃醢，力殫物耗，踵前功而不就。又各殞數千夫，積骸於逕之畔。邇者無有敢議其事者。」說明在高駢治理安南之前，唐朝已經有三位安南都護開鑿過「天威遙」運河。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八月，「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眾，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眾號四十萬」。<sup>88</sup> 梅叔鸞攻陷了安南都護府所在的交趾城，<sup>89</sup> 唐玄宗遂派右監門衛將軍宦官楊思勳率軍征討。《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列傳上·楊思勳傳〉記載，楊思勳「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由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遐謀，遂大敗，封屍爲京觀而還」。據此，楊思勳和安南大都護光

<sup>86</sup>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八，〈安南〉，頁8308。

<sup>87</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一：「欽廉海中有砂磧，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輿地紀勝》卷一一九，〈廣南西路·欽州·碑記〉，頁114引《烏雷廟記》稱：「自唐以來所有碑記今猶存，廟在城外半里」；（乾隆）《廉州府志》（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卷六，〈建置壇廟〉稱烏雷廟「祀馬伏波將軍，唐以來碑記尚存」。

<sup>88</sup> 《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列傳上·楊思勳傳〉，頁5857；《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楊思勳傳〉；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開元515號，頁1509。

<sup>89</sup> 《冊府元龜》卷六六七，〈內臣部·將兵〉，頁7976。

楚客都是由「馬援故道」出奇不意進軍安南剿滅梅叔鸞的。根據盧藏用所撰《景星寺碑》記載，光楚客此前曾任「檢校邕州都督，充開馬援古路使。北轉安南副都護」。<sup>90</sup> 所謂「開馬援古路使」，其使命必然包括了重新開鑿「天威遙」運河。從光楚客擔任「開馬援古路使」到開元十年又被唐玄宗任命為安南大都護，協同楊思勳征討安南梅叔鸞，可見唐朝重新開鑿「天威遙」具有明顯的軍事意圖。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至五年，張舟為安南都護。柳宗元記載「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鑾鐘，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sup>91</sup> 文單又稱陸真臘，環王國即林邑。張舟的這次出征應以在安南創建的水師為主。史書記載安南都護府「先有戰船，不過十數隻，又甚遲鈍，與賊船不過相接。張舟自創新意，造鑾鐘舟四百餘隻，每船戰手二十五人、掉手三十二人、車弩一支、兩弓弩一支、掉出船內，迴船向背，皆疾如飛」。<sup>92</sup> 據此可知，張舟在安南建造的海上戰艦可以裝備水軍兩萬人以上。柳宗元又記載，「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剝連鳥，以辟坦途，鬼工來並，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溝；摩霄之阻，誓為高岸。而終古蒙利」。<sup>93</sup> 即唐朝派兵跨越海道在安南等地進行的作戰，其水上戰艦的安全無法保證。因此，張舟遂組織大量人力開闢海上通道，其中最主要的工程應該就是「天威遙」運河。今「天威遙」運河中部西南段石壁上的刻字，尚見有「元和三年」字樣，字跡拙樸，大約是工匠或士兵的手跡，應該就是張舟開鑿「天威遙」過程中所留下的遺跡。然而，柳宗元所說「沃日之大，束成通溝；摩霄之阻，誓為高岸。而終古蒙利」，顯然並不符合歷史事實。根據《天威遙碑》的記載，其結果是「力殫物耗，踵前功而不就。又各殞數千夫，積骸於逕之畔。邇者無有敢議其事者」。

唐朝在安南所進行的多次大規模軍事行動，需要調動嶺南五管之兵以及中原內地的軍隊，均與這條「馬援故道」有關。例如，唐玄宗天寶後期，唐朝與南詔之間發生大規模戰爭。唐朝即調集嶺南五府之兵從安南進攻。天寶十二載（753）

<sup>90</sup> 盧藏用，〈景星寺碑銘〉，《全唐文》卷二三八，頁2408。

<sup>91</sup> 柳宗元，《柳河東集》（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一〇，〈唐安南都護張舟墓誌銘〉，頁149-152；《全唐文》卷五八九，頁5955；另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七三，〈安南都護府〉，頁1565。

<sup>92</sup> 《唐會要》卷七三，〈安南都護府〉，頁1566。

<sup>93</sup> 《柳河東集》卷一〇，〈唐安南都護張舟墓誌銘〉；《全唐文》卷五八九，頁5955。

五月，唐朝「以左武衛大將軍何履光將嶺南五府兵，擊南詔」。<sup>94</sup> 至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八月，西川度支副使劉辟發動叛亂。其時嶺南節度使徐申「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由爨蠻抵蜀，搗關不備。詔可」。<sup>95</sup> 唐德宗貞元以後，唐朝與南詔關係一度和好。以上記載意味著嶺南駐軍「循馬援故道」即由合浦越海至交趾，再由交趾經紅水河道進入雲南爨蠻的通道。而這條道路也是東漢馬援準備從交趾進軍益州的路線。<sup>96</sup> 以上說明唐朝的「馬援故道」不僅關係到安南的局勢，而且與唐朝對西南雲、貴、川地區的經營都有直接關係。裴鉞《天威遙碑》記載，東漢馬援在開鑿「天威遙」時「死役者不啻萬輩」，而唐朝前三任安南都護的開鑿，「又各殞數千夫，積骸於逕之畔」，一方面說明了「天威遙」運河工程異常艱險，同時也說明了安南海上通道對於中央王朝所具有的重要戰略意義。

### 三·晚唐海門鎮的崛起與安南前線的軍糧運輸

#### （一）晚唐安南的局勢與海門鎮的崛起

唐「安史之亂」後，嶺南道西部的「西原蠻」和「黃洞蠻」開始了長達一百多年的叛亂。而安南境內既有溪洞豪族的反叛，又有南詔、林邑等政權的多次進犯。在此情況下，確保「馬援故道」的暢通無阻，就成為唐中央王朝控馭安南以至穩定整個嶺南局勢的關鍵。唐朝為此創設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海門鎮。按唐朝海門鎮的確切地址，應在今廣西博白縣西南的南流江的出海口附近。而這裏也正是歷史上通往安南「馬援故道」的起點。關於唐代海門鎮開始設置的時間，近年出土的由崔元略於唐元和十年（815）撰寫的李輔光墓誌銘，稱「邕管地偏人狹」，「溪洞連結為盜者僅廿萬眾」。唐德宗皇帝「於是命公招諭」，「公素練兵機，具見腰領，巡視川谷，占其要害，奏請於海口置五鎮守捉」。<sup>97</sup> 唐德宗時期，嶺南邕管、容管均有不少州縣為「黃洞蠻」占據，原經由北流江和南流江前

<sup>94</sup> 《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寶十二載（753），頁6918。

<sup>95</sup> 《新唐書》卷一四三，〈徐申傳〉，頁4965；另見權德輿，〈嶺南節度使徐申行狀〉，《全唐文》卷五〇二，頁5109。

<sup>96</sup> 《水經注校證》卷三七，「葉榆河」，頁859。

<sup>97</sup> 崔元略，《唐故興元元從正議大夫行內侍省知省事李輔光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元和83號，頁2007；《全唐文》卷七一一，頁7375。

往安南的河運通道受到嚴重威脅。宦官首領李輔光被派往嶺南招撫。《新唐書·南蠻傳》記載貞元十年（794），黃洞蠻首領黃少卿攻邕管，邕管經略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四州」。<sup>98</sup>所謂「中人」即指宦官李輔光。根據以上的記載，李輔光雖然未能真正平息反叛，但卻促成了在「海口置五鎮守捉」。這裏的「海口」即是「海門」。而海門鎮設置的時間，可以確定在唐德宗貞元十年。按照唐朝軍制，每一上鎮為五百人。而在海門鎮「置五鎮守捉」，說明其規模相當大。

從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開始，南詔多次大舉進攻安南和邕管，嶺南西南部形勢急劇惡化，海門鎮和「馬援故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咸通三年（862）二月，南詔再攻安南。朝廷以蔡襲為安南經略使，「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sup>99</sup>唐懿宗咸通四年正月，南詔攻陷交趾（今河內）。唐朝遂於同年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sup>100</sup>說明唐朝的統治力量一度完全退出了安南。而海門鎮則成為安南都護府軍政機構的臨時駐所，並聚集了經由海上從安南撤回的大量官兵。唐懿宗在咸通四年七月發佈的詔令稱「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少」。<sup>101</sup>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唐朝採取了多方面的重要措施。首先，唐朝在海門鎮開始大量集結軍隊和準備渡海作戰的大量帆船和糧食，使之成為收復安南的軍事基地；其次，唐朝對嶺南道行政區劃也進行了重大改革。咸通三年五月，唐朝為了加強對嶺南西部的控制，正式將原嶺南道一分為二，在廣州設嶺南東道節度使，在邕州設嶺南西道節度使。<sup>102</sup>這是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唐朝從全國各地徵調重兵，咸通四年三月，任命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sup>103</sup>《新唐書·南蠻傳》則記載康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任命宋戎為安南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咸通五年（864）一月，「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袁、

<sup>98</sup>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頁6330。

<sup>99</sup>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三年，頁8096。

<sup>100</sup> 同前卷，頁8105；《新唐書》卷二二二中，〈南詔傳〉，頁6284。

<sup>101</sup> 《冊府元龜》卷一四七，〈帝王部·恤下〉，頁1784。

<sup>102</sup>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52。

<sup>103</sup>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四年（863）三月，頁8104。

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sup>104</sup> 據此可知，唐朝從北方內地徵集的五萬以上精銳，主要集結在海門鎮和邕州兩地。除此之外，唐朝還在洪州（今南昌）建立鎮南軍以策接應嶺南。<sup>105</sup>

直到咸通六年七月，安南都護高駢率五千禁軍從海門鎮出發，沿「伏波故道」一舉收復交趾，結束了安南地區長達十年的戰亂。史載安南都護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自李琢失政，交趾陷沒十年。蠻軍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復故地」。<sup>106</sup>《舊唐書·高駢傳》記載自從安南陷落，「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為安南都護。至則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內，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sup>107</sup> 可見，高駢也是從海門鎮出發，循「馬援故道」出奇不意地跨海收復安南的。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西容縣出土了《唐容管經略押衙安子遠墓誌銘》，稱「屬者地連溪洞，境接交、邕，蠻蜚類繁」，「乃命公充海門防戍軍都知兵馬使」。安子遠以乾符二年（875）八月二十三日，「終於海門軍營官舍」。<sup>108</sup> 說明此時的海門已經從「海門鎮」進一步升格為「海門防戍軍」。五代十國時期海門鎮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至北宋初則升格為海門軍。<sup>109</sup>

裴鉶《天威遙碑》稱自從高駢收復安南，「然運粟走食，尙阻洪濤」。前引北宋人為《天威遙碑》所寫的跋文亦稱：「咸通中，渤海公高駢南征，開治糧道。」說明高駢在收復安南後，開鑿「天威遙」最直接和最緊迫的原因，還是安南前線數額巨大的軍需糧餉運輸。由於唐後期嶺南戰事頻仍而持久，特別是安南形勢的惡化，全國各地軍隊大量集結在嶺南，其所需糧餉大部分則需要由江南東道、江南西道等內地承擔。而此時承擔大規模軍糧運輸的主要通道分海、陸兩路。對安南軍糧的運輸一時竟成為唐朝整個國家最緊迫的任務之一。

<sup>104</sup> 《資治通鑒》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五年（864），頁8108。

<sup>105</sup> 同前卷，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四月，頁8111。

<sup>106</sup> 《唐會要》卷七三，〈安南都護府〉，頁1567。

<sup>107</sup> 《舊唐書》卷一八二，〈高駢傳〉，頁4703。

<sup>108</sup> 易紹修，封祝唐墓，《容縣誌》（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196號〔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1989〕，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本），卷二四，〈金石志〉，頁967-971。

<sup>109</sup> 曾鞏，《隆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1冊），卷一，頁11稱：「太平興國八年（983）以海門鎮為太平軍。」又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6），卷三二三，〈輿地考九·廉州〉。

## （二）從靈渠經海門鎮到安南的軍糧運輸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商隱為桂州刺史鄭亞所作〈為滎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sup>110</sup> 真實地反映了雖然當時安南形勢尚較穩定，但是遠離安南的桂管即負擔了安南都護府境內相當繁重的兵員和軍需的供應。船隊從桂州（桂林）出發到達海口附近的海門鎮，所需時間竟達三個月還加五天。且途中因遭遇惡風，致使「漂溺官健一十三人」，「沈失器械一千五百餘事」。而從海門鎮前往安南的海上通道，「巨浪颶風」和船難等也頻繁見於記載。可見，即使是當時最為便捷的水上航運交通，其艱險也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唐懿宗咸通年間，靈渠以及從靈渠通往海門鎮的陸上河運通道，承擔著向安南輸送軍糧的繁重任務。史載咸通三年（862）夏，「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湘漓泝運，功役艱難」。<sup>111</sup> 唐僖宗發佈的〈乾符二年南郊赦〉尚提及，咸通五年（864），「梧州糴十萬石米，停儲數載之後，方令盤送邕、交」，「所以經年累月，舳艫相交，江路多有沉淪，軍食常憂欠缺」。<sup>112</sup> 地處灕江與潯江交匯點的梧州，在當時是為安南轉運、貯存軍糧的中心之一。「江路多有沉淪」也證明了從靈渠到海門鎮的陸上河運十分艱難。《唐六典》記載，「給公糧者」，「丁男日給米二升」。<sup>113</sup> 我們姑且以每名士兵每天需要二升（斤）糧食計算，海門鎮和邕州等地集結的五萬官兵每天就需要十萬斤糧食，全年則需要三十六萬五千斤。可見無論徵集還是運輸，在當時都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也就是高駢開鑿「天威遙」的同一年，時任桂州刺史的魚孟威亦大規模的重新整修靈渠。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所稱「況近歲來蠻寇猶梗，王師未罷」，<sup>114</sup> 即主要與安南的形勢直接相關。魚孟威整治靈渠的直接原因就是為安南等地饋運軍糧。碑文稱靈渠經過這次治理，「雖百斛大

<sup>110</sup> 李商隱，〈為滎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全唐文》卷七七二，頁8052。

<sup>111</sup>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唐會要》卷八七，〈漕運〉，頁1895。

<sup>112</sup> 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七二，頁403。

<sup>113</sup>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一九，〈太倉署〉，頁527。

<sup>114</sup> 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八一三，〈河渠〉，頁4297。

舸，一天可涉」。《新唐書》記載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鐫隄，亙四十里，植大木爲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sup>115</sup>

### （三）從揚州至海門鎮再到安南的海路運輸

唐朝從江淮等地經海上向安南等地大規模運輸軍糧，開始於咸通三年（862）夏。由於南詔攻陷交趾，唐朝徵集諸道重兵集結在嶺南。然而由於自湘江入靈渠饋運軍糧十分艱難，致使「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礪石詣闕上書稱：「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矣。」朝廷遂任命陳礪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sup>116</sup>即從江淮等地徵集軍糧集中在揚州的鹽鐵院，由國家的漕運船隊經過東南沿海航運到廣州，再由廣州沿近海航道運送至海門鎮，或再轉運至安南。眾所周知，江淮是唐朝後期最重要的賦稅來源地，揚州則是南北漕運的樞紐。不過，這種大規模運輸軍糧也對江淮及東南沿海的水上商業運輸造成了嚴重影響。唐懿宗咸通五年制文提及，「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訪問商徒，失業頗甚，所由縱捨，爲弊實深」。<sup>117</sup>《資治通鑑》也記載：「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系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sup>118</sup>說明由於安南軍情緊急，唐朝還強行徵調大量商人海舶以運送軍糧。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當時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軍糧轉輸網絡，東起江淮，從揚州沿東南沿海，經廣州至雷州半島，沿北部灣近海至海門鎮；或由贛江經過吉州、虔州，從大庾嶺梅關古道越五嶺，沿北江直至廣州。<sup>119</sup>也可從廣州溯西江至梧州，與從靈渠到海門鎮的河運路線重合。而海門鎮即成爲海上運輸和陸上河運的交匯點，並由此再轉運到安南。直到光啓元年（885）三月，唐僖宗發佈的〈車駕還京師德音〉還稱：「自蠻寇侵擾，連歲用兵。耗蠹生靈，海運爲甚。驅我赤子，深入滄波，睹駭浪而魂飛，汎洪濤而心死，繼有覆溺，多不上聞。仍遣

<sup>115</sup> 《新唐書》卷四三上，〈地理志〉，頁1105。

<sup>116</sup>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52；《資治通鑑》卷二五〇。

<sup>117</sup>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57。

<sup>118</sup>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四年七月，頁8106。

<sup>119</sup> 《新唐書》卷一八五，〈鄭畋傳〉，頁5402。

賠填，急於風火。哀其已死之眾，不可復追；念茲將斃之徒，用延餘息。」<sup>120</sup>唐僖宗在詔令中特地提到了自宣宗大中後期以來，唐朝舉全國之力在北部灣一帶所進行的軍隊調遣和軍糧的運輸。詔令反映出這種海上運輸既是唐朝整個國家的沉重負擔，而其中的艱難困苦也是當時唐朝君臣和民眾不堪回首的記憶。

晚唐王朝與南詔爭奪安南的戰爭，實際上使雙方都元氣大傷，其對唐朝的影響可謂極其深遠，歷史學家一般都認為這是唐朝走向最後衰落的起點，即「蠻蜚未賓於遐裔，寇竊復蠹於中原」。<sup>121</sup>《新唐書》稱「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勳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sup>122</sup>范祖禹亦稱：「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sup>123</sup>

我們認為，只有將晚唐高駢開鑿「天威遙」運河置於漢唐時期中央王朝經營安南的歷史以及晚唐特定的時代背景中，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一歷史事件。由於漢唐時期安南海上通道所具有的極為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天威遙」運河開鑿始於東漢初年的馬援，而且本身就是「馬援故道」的組成部分。唐朝的幾次開鑿包括高駢的開鑿，都是試圖要盡力保障「馬援故道」的暢通。至於唐後期海門鎮的創設，亦是為了保證「伏波故道」的暢通。當然，「天威遙」海上運河開鑿的原因並不僅限於政治和軍事方面。高駢在給朝廷的上奏中就明確稱「人牽財利」，「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自然貨殖貿遷，華戎利涉」。<sup>124</sup>說明其在南海國際貿易中的意義也很突出。對此，我們有專文討論。<sup>125</sup>至於《天威遙碑》所載運河開鑿過程中所蘊涵的複雜而豐富的歷史內容，則是需要我們用心發掘和探討的課題。

<sup>120</sup> 唐僖宗，〈車駕還京師德音〉，《全唐文》卷八九，頁926。

<sup>121</sup>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67。

<sup>122</sup> 《新唐書》卷二二二中，〈南蠻傳中·贊曰〉，頁5295。

<sup>123</sup> 范祖禹，《唐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一一。

<sup>124</sup> 《冊府元龜》卷六七八，〈牧守部·興利〉，頁8103。

<sup>125</sup> 王承文，〈越南現存〈大隋九真郡寶安道場之碑文〉考釋〉，《文史》89（2009.4）：59-86；〈晉唐時代嶺南地區金銀的生產和流通——以敦煌所藏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為中心〉，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505-548。

## 肆·碑文所見「天威遙」運河開鑿與北部灣沿岸「雷神」信仰

晚唐高駢開鑿安南海上通道之事，在當時是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事件。因此，正史和相關典籍文獻，都有專門而又簡約的記載。我們有必要加以辨析。

（一）成書於五代後晉開運二年（945）的劉昫《舊唐書·懿宗紀》記載，咸通八年（867）三月，「安南高駢奏：『〔安〕南至邕管，水路湍險，巨石梗塗，令工人開鑿訖，漕船無滯者。』降詔褒之」。<sup>126</sup> 從安南通往邕管的所謂「水路」應指海路。欽州灣畔的欽州即屬於邕管。欽州灣亦是沿北部灣沿海前往安南的必經之地。至於「水路湍險」，前引周去非即記載這條海路一方面是「亂流之際，風濤多惡」，另外還有不少暗礁險灘。《舊唐書·高駢傳》稱高駢收復安南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澀，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天子嘉其才」。<sup>127</sup>

（二）五代宋初孫光憲（896-968）所撰《北夢瑣言》記載：「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sup>128</sup>

（三）宋太宗建隆二年（961）成書的王溥《唐會要》記載，咸通八年三月，「安南都護高駢奏：『安南至邕管，水路湍險，已令工人鑿去巨石，漕船無滯。』詔褒美之」。<sup>129</sup>

（四）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成書的《冊府元龜》卷六七八〈牧守部·興利〉記載：「高駢咸通末爲安南都護，奏開本州海路，從之。初，交趾以北，距南溟（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然在於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財利，石限衡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自然貨殖貿遷，華戎利涉。』時有詔聽之。」

<sup>126</sup> 《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頁661。按中華書局現標點本原文中「南至邕管」，應是「安南至邕管」之誤。

<sup>127</sup> 同前書，卷一八二，〈高駢傳〉，頁4703。

<sup>128</sup> 《北夢瑣言》卷二，頁36。

<sup>129</sup> 《唐會要》卷八七，〈漕運〉，頁1895。

駢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民，至今賴之以濟焉。」<sup>130</sup> 然而，《冊府元龜》卷四四七〈將帥部〉又記載，高駢「自咸通中復交趾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西川板築羅城，心匠天機，謂能驅役鬼神」。<sup>131</sup>

（五）北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曾公亮等奉敕編成的《武經總要前集》，稱邕州「南至交州界七百里，舊至交趾，水路險險，巨石梗塗，高駢在安南鑿開，迄今舟楫無滯」。<sup>132</sup>

（六）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成書的歐陽修等著《新唐書》記載高駢在安南：「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剋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sup>133</sup>

（七）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成書的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咸通八年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sup>134</sup>

在宋、元、明、清時期的各種文獻中，尚有大量的關於晚唐高駢開鑿「天威遙」的記載，然而一般都是在以上材料的基礎上形成的。綜合以上各種記載，我們要指出幾點：第一，高駢向朝廷提出開鑿「天威遙」的上奏應在咸通八年三月。但是，根據裴鉞《天威遙碑》的記載，「天威遙」的真正開鑿始於咸通九年四月，而鑿通的時間應在咸通九年九月十五日。因此，《舊唐書》、《唐會要》和《資治通鑒》等，顯然是將高駢的上奏與開鑿完成誤為同一個時間；第二，高駢所上奏文在以上《冊府元龜》與《北夢瑣言》中都有保存。二者雖略有差異，但應為同一個來源。《全唐文》所收高駢〈請開本州海路表〉即源於此。<sup>135</sup> 至於《唐會要》中的高駢奏文應源自《舊唐書·懿宗紀》。不過，《舊唐書》中的高駢奏文明顯是經過了編者的剪裁改寫，而且其意義已經相當含糊不清；第三，

<sup>130</sup> 《冊府元龜》卷六七八，〈牧守部·興利〉，頁8103。

<sup>131</sup> 同前書，卷四四七，〈將帥部·縱敵〉，頁5304。

<sup>132</sup>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6冊），卷二〇，〈邊防·廣南西路·邕州〉。

<sup>133</sup> 《新唐書》卷二二四下，〈叛臣下·高駢傳〉，頁6392。

<sup>134</sup> 《資治通鑒》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八年二月，頁8118。

<sup>135</sup> 高駢，〈請開本州海路表〉，《全唐文》卷八〇二，頁8429。

以上材料大多都是講開海道，而沒有提到在江山半島陸上開鑿運河之事。應該是高駢在上奏中所提到的「石限衡津」和「今若稍加疏鑿」，直接影響了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等大量文獻典籍的記述，一般都錯誤地認為，高駢所開鑿的就是海中阻礙航運交通的「巨石」或「隱石」。我們認為，這種記載一方面不符合當時工程技術所能達到的實際水平，另一方面，在今廣西江山半島的白龍尾一帶海面仍有大量礁石橫互，即使在今天，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海上船舶航行的威脅。不過，《冊府元龜》又記載，高駢「自咸通中復交趾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西川板築羅城，心匠天機，謂能驅役鬼神」，與該書前面記載開鑿海中「巨石」明顯不同。所謂「於安南開鑿河道」，說明所開鑿的是陸地上的河道，實際上已經接近開鑿人工運河了。

我們在此還要特別強調的是，高駢開鑿的「天威遙」應是江山半島上的人工運河而非海中的通道。碑中最後的銘文先備述「天威遙」海道的兇險，然後稱「我公振策，勵山鑿石。功施艱難，靈助震激」。所謂高駢「勵山鑿石」，就是指開鑿江山半島上的石山。碑文中提到「或有磊磊者，落落者，約人而不能舉〔者〕，俱爲雷之攫挈擲於兩峰耳」，是說「轟雷燐電」將河床上巨大的石塊拋向河道兩邊的山峰上。至於碑文中所謂「巨石乃墮裂，有泉迸出，味如甘醴」，應是指高駢在開鑿「天威遙」陸上運河的過程中，開通了山石間的地下水流。毫無疑問，無論是開鑿海水中的「巨石」，還是開鑿海水下面的「潛石」或「暗石」，都不可能出現「有泉迸出，味如甘醴」的情形。這種情況只有在陸地上才會出現。而這一點也恰恰是歷史上江山半島古運河區淡水河流形成並至今仍長流不息的主要原因。碑文所謂「泉驅來而走碧，橋架險以橫虹」，說明當時高駢等還在「天威遙」運河上架設了橋樑。

前引宋代《嶺外代答》記載《天威遙碑》稱，高駢三次「虔禱」雷電之神，「悉碎餘石，遂成巨川。自是舟運無艱，名之曰天威遙」。所謂「巨川」當然是指陸地上的「天威遙」這條運河。周去非又稱「退而求諸傳，載天威遙事略同，但不若是詳爾」。意即新、舊《唐書·高駢傳》等資料所載開海道事蹟，與《天威遙碑》開鑿運河本身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只是記載詳略的差別。而且碑文已經明確記載，從東漢初年的馬援開始到晚唐的高駢，這條運河工程「乃鑿石穿山」，其目的恰恰就是爲了「遠避海路」。

裴鏘《天威遙碑》詳細記載了高駢開鑿「天威遙」的具體情形。碑文中的「攝長吏林諷」應為「攝長史」之誤。<sup>136</sup> 同時，參與開鑿「天威遙」運河工程的人員構成，並非是《舊唐書》、《唐會要》和《資治通鑑》等所記載的是「購募」而來的「工人」或「工徒」，主要是隨高駢出征在安南的湖南官兵以及水手共一千多人。在今運河中部的西南段石壁上所鐫刻的「湖南軍」、「咸通九年三月十日下手」等字樣，即與此直接相關。從咸通八年三月高駢上奏獲得朝廷批准，到第二年四月五日正式動工之前，大概屬於工程的勘察設計和準備階段。碑刻記載，高駢也一反「前時都護，乃犒師不至，持法不堅，博約營私，人須怠惰」的情形，而是親自踏勘，並且「豐備資糧，銳斧剛鑿」，做好了開鑿工程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充分準備。《北夢瑣言》等還稱「啖以厚利」。以上均顯示了高駢謀略幹練和勇於事功的特點。

高駢的鑿通實際上所花費的時間是五個多月，時間不算太長，人員規模也未超過前面幾次。高駢〈請開本州海路表〉稱：「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因此，高駢應是在漢代馬援和唐朝幾位前任安南都護已有的基礎上進行的。高駢的工程應主要是將幾處地勢頗高的山峪鑿通。鑿開堅硬的海石結構的石床極其艱巨，而這一點既是前人沒有成功的原因，也同樣是高駢等所面臨的嚴重困難。碑文稱：「是石堅而頑，盤而厚，併手揭折，聚力鑿槌，逾月之間，似欲開濟，但中間兩處，值巨石嶄嶄焉。繚互數丈，勁硬如鐵，勢不可減。鑿下刃卷，斧施柄折。役者相顧，氣沮手柔，莫能施其巧矣。」

值得注意的是裴鏘在碑文中用超乎尋常的篇幅，敘說了雷電之神的關鍵作用。碑文稱：「渤海公心無私戚（契），精貫上元，使列缺之與豐隆，矜神功而誇妙用。〔靈祇陰相〕，風雲接助，增益勳庸。感應如斯，古無儔匹」，「功施艱難，靈助震激」。所謂「使列缺之與豐隆，矜神功而誇妙用」，是指高駢用法術請來「雷公電母」而競相施展神力。「豐隆」或稱「豐崇」，古代指雷師或稱雷公、雷神；「列缺」則指閃電之神。<sup>137</sup> 碑文詳細地描述了在工程最艱難時，

<sup>136</sup>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三二，〈職官十四·都護〉，頁896稱都護府有「長史、司馬各一人」。

<sup>137</sup> 根據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一，屈原詩有「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注曰：「豐隆，雷師」；見《楚辭章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2冊），頁10。《水經注校證》卷一，〈河水〉稱「豐隆，雷公也」。據《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八七，〈揚雄傳〉，揚雄賦有「辟歷列缺，吐火施鞭」，唐顏師古引東漢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

高駘祈請雷電之神三次轟開巨石的經過。《天威遙碑》在銘文中再次稱：「天地汗漫，人力微茫」，「天道開泰，神威秉持」。總之，碑文極力強調「天威遙」最終開鑿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高駘得到了天神雷電之神的幫助。

碑文所謂「遂使決洩一派，接引兩湖，中間合流，無纖阻窒（滯）。經過卒校，梯溟漲而不艱危；趨運倉儲，棹舟航而無覆沒」，「洩海成派，泛舟不窄。渤海（溟漲）坦夷，得餉我師」。以上都是指由於「天威遙」的鑿通，使江山半島以南的珍珠灣和以北的月亮灣得以連接，無論是軍隊的調遣，還是軍糧的饋運，都可以在此通行無阻。至於碑文前面提及白龍尾一帶最危險的所謂「三險」，碑文又稱：「今則安流坦途，不復經斯險矣！」說明海上船舶在此終於可以繞開白龍尾一帶的三種巨大危險。「渤海公之功績，與鑿汴渠、開桂嶺，可等肩而濟其寰區耳」，碑文認為高駘的功績完全可以與秦朝史祿開鑿靈渠、東漢時開鑿汴渠一樣造福人間。<sup>138</sup> 而且碑文在此所列舉的也都是歷史上著名的人工運河。

如果比較裴鉉《天威遙碑》和相關正史等資料的記載，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那就是碑文所描述的大量神異情節，在正史中大都被刪除無遺，往往只記載開海路以便於糧餉運輸之事。《新唐書》僅僅略載以雷震碎巨石之事。《資治通鑑》則完全不予提及。《舊唐書》僅簡單地提及高駘「作法」打碎巨石一事。五代《北夢瑣言》稱「或言駘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反映了其對此事持某種懷疑的態度。然而，孫光憲在記載唐末王審知以同樣的方法在福州開甘棠港後，又稱：「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sup>139</sup>「渤海」即指渤海公高駘，因而還是肯定高駘是「假神之力」完成了這一工程。《冊府元龜》的兩處記載則差異較大，該書卷六七八〈牧守部·興利〉完全不涉及任何神異情節，而該書卷四四七〈將帥部〉，則記載高駘「自咸通中復交趾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心匠天機，謂能驅役鬼神」，顯然也是指高駘得到了雷電之神的幫助。元代黎崱《安南志略》雖然收錄了《天威遙碑》，但是僅稱高駘「以南海至交州，有石隱水中，常覆巨舟，遂奏削去其石。交、廣之民，舟楫安行」。<sup>140</sup>

<sup>138</sup> 《後漢書·明帝紀》記載永平十二年（69），「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工程為引黃河水南流入淮水。

<sup>139</sup> 《北夢瑣言》卷二，頁36。

<sup>140</sup> 《安南志略》卷四，〈前朝征討〉，頁99。

高駢和裴鏘親身經歷過這一歷史事件，卻都對此深信不疑。《天威遙碑》和《嶺外代答》記載高駢多次通過特定的齋戒儀式祈請雷神施法，而且還在「天威遙」一帶建置了專門祭祀雷電之神的神室雷祠，也說明高駢對雷電之神有虔誠的信奉。公元八八〇至八八四年，崔致遠（857-?）擔任時任淮南節度使的高駢的重要幕僚，崔致遠所撰〈補安南錄異圖記〉記載了唐朝安南都護府的地理狀況以及高駢治理安南的業績，其文稱高駢：

然後使電母雷公，鑿外域朝天之路；山靈水若，偃大洋沃日之波安南經岸口、天威，神功所開，播在遠邇。遂得絕蠻謀之北窺，紆漢軍之南戍。乃鳳傳徵詔，鷁泛歸程，至於洞獠海蠻，莫不醉思飽義，遠投聖闕，請建生祠。則知善政可行，殊方可誘。……今聖上省方，蒙王獻款，不敢弄吠堯之口，永能除猾夏之心。皆由燕公收交州、鎮蜀郡，威振於奔魑走魅，功成於金壘湯池。所謂蘊先見之能，察未來之事，呼吸而陰陽不測，指蹤而神鬼交馳。實為天工，人其代之，斯實可為異矣。<sup>141</sup>

崔致遠在高駢淮南幕府時距離安南開鑿「天威遙」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其追述雷電之神在開鑿「天威遙」中的關鍵作用，顯然是受到高駢本人影響的結果。崔致遠在揚州為高駢所作〈幽州李可舉太保五首〉之第五曰：

《安南開海圖》一面，《西川羅城圖》一面，並八幅紫綾緣。……頃者銅柱南標，金墉西建，開八百里之險路，則雲將驅石，雷師劈山；築四十里之新城，則水神滲泉，地媪供土。蓋乃感忠誠於上鑒，標壯觀於外藩。敢言簡在帝心，實匪率由人力。今則八蠻歸化，萬乘省方，既能有備無虞，亦所當仁不讓。去年嘗傳雅旨，欲覽微功，乃徵於墨妙筆精，遍寫彼長途峻壘。宛如縮地，不止移山。<sup>142</sup>

以上說明高駢曾經命人繪製《安南開海圖》，以地圖的形式「遍寫彼長途峻壘」。所謂「開八百里之險路」，當是指高駢率軍從今廣西境內的海門鎮向安南交趾等地進軍的路線。而「雲將驅石，雷師劈山」，則是指開鑿「天威遙」運河過程中得到了雷電之神的大力幫助。至於《西川羅城圖》是指高駢在其後任西川節度使期間曾經重修成都城。在這一過程中，高駢也同樣得到了「水神」和「地

<sup>141</sup> 崔致遠撰，黨銀平校注，《桂苑筆耕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一六，頁554-555。

<sup>142</sup> 同前書，卷一〇，頁302-303。

媼」的幫助。崔致遠〈天威徑〉一詩又稱：「鑿斷龍門猶勞身，擘分華嶽徒稱神。何如劈開海山道，坐令八國爭來賓。」<sup>143</sup> 所謂「鑿斷龍門」是指大禹借助神力疏浚黃河的傳說。《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禹鑿龍門」。東漢袁康所著《越絕書》卷一一稱大禹「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至於所謂「擘分華嶽」，根據唐代李善所作《文選》注，傳說太華、少華本為一山，擋黃河，黃河神以手擘開，中分為二，以通水流。<sup>144</sup> 崔致遠認為，高駢得到「雷公電母」的幫助而「劈開海山道」，並引來了雲南八國爭相來朝貢，其神奇性要遠超大禹和黃河神的傳說；其〈峽口徑〉一詩又稱：「濟物能回造化心，驅山偃海立功深。安南真得安南界，從此蠻兵不敢侵。」<sup>145</sup> 據此，高駢主持的開鑿海上通道工程除了「天威遙」之外，還有「峽口徑」等。崔致遠還有〈執金吾〉一詩稱：「一陣風雷定八蠻，來趨雲陛悅天顏。王孫仕宦多榮貴，新為匡君不暫閑」。所謂「一陣風雷」也是指借雷電之神的幫助。

崔致遠，新羅國人，字海夫，號孤雲，諡文昌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隨新羅商船渡海入唐求學，時年十二歲。咸通十五年（874），進士及第。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入淮南節度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高駢揚州幕中，甚為高駢禮遇，先後任都統巡官、館驛巡官等職。至中和四年（884），崔致遠以唐使節身分回歸新羅。光啓二年（886）編成《桂苑筆耕集》二十卷。雖然崔致遠沒有親歷安南「天威遙」工程，但是明確記載是高駢祈請「雷公電母」鑿開了作為「外域朝天之路」上的「天威遙」。而與崔致遠同在淮南節度使府為高駢掌書記的顧雲也有相同的記載，《全唐詩》所收顧雲〈天威行〉一詩曰：

蠻嶺高，蠻海闊，去舸迴艘投此歇。一夜舟人得夢間，草草相呼一時發。  
颶風忽起雲顛狂，波濤擺掣魚龍殭。海神怕急上岸走，山燕股慄入石藏。  
金蛇飛狀霍閃過，白日倒掛銀繩長。轟轟礪礪雷車轉，霹靂一聲天地戰。  
風定雲開始望看，萬里青山分兩片。車遙遙，馬闐闐。平如砥，直如弦。  
雲南八國萬部落，皆知此路來朝天。耿恭拜出井底水，廣利刺開山上泉。  
若論終古濟物意，二將之功皆小焉。<sup>146</sup>

<sup>143</sup> 《桂苑筆耕集校注》卷一七，頁595。

<sup>144</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71；袁康著，吳平點校，《越絕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張衡，〈西京賦〉及李善注；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一，頁37。

<sup>145</sup> 《桂苑筆耕集校注》卷一七，頁596。

<sup>146</sup> 《全唐詩》卷六三七，頁7302。按，《雲南通志》誤將其作為雲南「天威徑」的詩收入；

顧雲在〈天威行〉詩中，詳細描述了高駢開鑿「天威遙」過程中雷公電母施展神功驚心動魄的情形。認為東漢西域都護戊己校尉耿恭，以及西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二人用神奇方式引出泉水的傳說，<sup>147</sup> 尙遠不足以與高駢開鑿「天威遙」並引出泉水奔流的事蹟相提並論。

在雲南大理地區的太和縣有一處稱為「石門」的關隘遺址，三國時期諸葛亮征討西南民族首領孟獲曾經過此地，歷史上為紀念諸葛亮又稱此地為「天威徑」或「天威逕」。由於高駢後來還在西川節度使任上征討過南詔，加上顧雲詩中有「雲南八國萬部落，皆知此路來朝天」，明、清兩代不少知名學者都錯誤地把以上顧雲〈天威行〉和高駢自己的〈過天威徑〉，當作是描寫雲南「天威徑」的詩。<sup>148</sup> 伯希和、嚴耕望等學者研究過唐代安南與雲南的交通。<sup>149</sup> 此處所謂「雲南八國萬部落，皆知此路來朝天」，實際上應是指由於高駢在安南對南詔戰爭的勝利，雲南各部落亦可通過安南並經由高駢開鑿的「天威遙」來向唐朝朝貢了。

顧雲為唐末著名文人。根據宋代《唐詩紀事》等記載，顧雲，字垂象，池州人。咸通十五年進士。授校書郎，高駢為淮南節度使，辟為從事，屬於高駢的核心幕僚。畢師鐸之亂，退居雪川。唐昭宗大順（880-891）中分修德宗、宣宗、懿宗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乾寧（894-898）初卒。<sup>150</sup> 顧雲與崔致遠是同榜進士。崔致遠在給高駢的〈獻詩啓〉中提及：「某竊覽同年顧雲校書獻相公長啓一首，短歌十篇，學派則鯨噴海濤，詞鋒則劍倚雲漢。備為讚頌，永可流傳。」<sup>151</sup> 所謂「短歌」即包括〈築城行〉和〈天威行〉等。總之，無論是當年

---

見《雲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0冊），卷二九之十三，〈古歌謠〉，頁664。

<sup>147</sup> 《後漢書》卷一九，〈耿恭列傳〉，頁721。

<sup>148</sup> 謝肇淛，《滇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4冊），卷二，頁113；顧祖禹稱雲南麗江的「重險」有石門，其地亦名天威逕，「以武侯（即諸葛亮）七擒孟獲而名」，引唐朝顧雲詩「雲南八國萬都（部）落，皆從此路來朝天」，並稱「蓋石門之系於雲南非淺鮮矣」；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三，〈雲南·西洱河〉，頁5056；（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三七八，〈大理府圖·古跡·天威逕〉，頁91。按以上各書誤附有高駢〈過天威徑〉和顧雲〈天威行〉詩。

<sup>149</sup> 參見伯希和撰，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唐代滇越道〉，頁1321-1335。

<sup>150</sup> 《唐詩紀事》卷六七，〈顧雲〉；《全唐文》卷八一五，〈顧雲小傳〉。另參見凍國棟，〈顧雲籍貫、歷官考〉，陳國燦、劉健明主編，《〈全唐文〉職官叢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頁417。

<sup>151</sup> 《桂苑筆耕集校注》卷一七，頁583。

親身經歷的高駢和裴鏘，還是高駢後來的幕府官員，都深信高駢是依靠「雷公電母」的巨大神力，才最終完成了安南「天威遙」運河的開鑿。

《大越史記全書》作為越南古代最重要的史書，該書敘述高駢開鑿天威遙之事直接依據了《天威遙碑》，而且其中大量語句直接出自碑文。其文又有：

史臣吳士連曰：高駢鑿港之役，何其異耶？蓋所〔行〕合理，故得天之助也。天者理也。地道有險夷，理之常也。人力有濟險，亦理之常也。苟險而不能濟，天何假於人哉！禹之治水，苟不合於理，天何由成，地何由平也。其效至於洛龜呈祥，非天之助乎？觀駢之言，曰「今鑿海派，用濟生靈，苟不徇私，何難之有？」誠發於言，言豈不順乎？孚信所感，通乎金石，況於天乎！天所助者助也。《易》曰：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雷震巨石以助之，何足為怖也！<sup>152</sup>

越南史家吳士連將高駢鑿通「天威遙」運河與神話傳說中大禹治水得到天神幫助相提並論。<sup>153</sup> 明代安南無名氏所撰《越史略》卷上〈高駢傳〉有關「天威涇」的開鑿，也直接依據《天威遙碑》，其中有高駢祈請雷電之神的事蹟。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高駢和裴鏘等為什麼會如此強調雷電之神在「天威遙」運河工程中的特殊作用？泰勒 (Keith Weller Taylor) 認為，在這一事件中，高駢因為能夠獲得具有超自然力量的雷神的恩寵和幫助，從而證明了自己的美德。<sup>154</sup>《越南漢喃銘文彙編》的整理者也認為，碑文經過這樣的神異情節，高駢就被描述成爲一個有氣魄，大公無私，又博得神祇扶助的武將。<sup>155</sup> 我們認為在這種非常罕見的現象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歷史原因值得進一步探討。歷史資料證明，高駢是一個信奉鬼神極其虔誠的人。一生所到之處，幾乎都與各地的地方神靈有關。而這篇碑文最重要的史料價值之一，就是真實地反映了唐朝北方官員士大夫與嶺南沿海地區極爲盛行的雷神信仰之間的密切關係。高駢所祈請的「雷公電母」應是雷州半島和北部灣沿岸地區所信奉的最主要神靈。雷神亦稱「雷公」、「雷師」或「雷君」。唐朝很多地方都有雷神的記載，其形象大多爲豬首

<sup>152</sup>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頁167-168。

<sup>153</sup> 《越絕書》卷一，頁81稱大禹「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

<sup>154</sup>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51.

<sup>155</sup> 《越南漢喃銘文彙編》，頁32。

鱗身，有翼能飛。<sup>156</sup> 雖然雷神的信仰在各地都較為普遍，但是在古代中國的正統宗教和祭祀禮制中，雷電之神的地位都很低。然而，遙在唐朝嶺南道北部灣沿岸地區，雷神卻是當地民間信仰中最重要的神靈。薛愛華認為，「所有唐朝的資料都認同雷神的祭祀以雷州半島的雷州為中心」。<sup>157</sup>

雷州成為唐朝各地雷神崇拜最盛地區的原因，首先與雷州一帶特殊的自然環境有關。雷州一直以多雷著稱。唐代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一詩稱雷州「海霧多為瘴，山雷乍作鄰」。<sup>158</sup>《唐國史補》卷下稱「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唐宣宗大中（847-860）年間，房千里為高州刺史，其地鄰近雷州。房千里在其《投荒雜錄》中詳細記載了雷州地區盛行雷神信仰的根源，稱「唐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恒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sup>159</sup> 其次，唐代雷州和北部灣沿岸一帶的雷神崇拜，已經與古代南越和俚獠等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宋代蔡條記載嶺南少數民族將雷神作為「天神」崇祀的風俗，「獨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謂之天神」。<sup>160</sup> 古代南越民族流行的文身圖紋以及銅鼓上雷形紋樣均與對雷神的崇祀有關。<sup>161</sup> 南越民族的文身源於對龍的崇拜。龍興風作雨，被看成是雷電產生的根源。古代越族及其後裔也把鼓聲作為雷的象徵。銅鼓既是迎神賽會驅鬼祈雨的法物，又是擁有權威的象徵，同時還是一種象徵雷神之製作。海南島的黎人自古至今都有其祖先為雷攝蛇卵而誕生的傳說。關於古代嶺南俚獠民族中雷攝蛇卵的傳說，現存最早的記載亦見於唐朝《投荒雜錄》。<sup>162</sup> 因此，嶺南沿海的雷神信仰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

歷史資料證明至遲在唐朝中期以前雷州已建有專門祠祀「雷神」的雷公廟，然而長期屬於「淫祀」。<sup>163</sup> 根據宋初《太平寰宇記》記載，雷州有「雷公廟，

<sup>156</sup> 見《太平廣記》卷三九三，〈雷一〉至卷三九五，〈雷三〉，頁3136-3162。

<sup>157</sup> 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 p. 105.

<sup>158</sup> 《全唐詩》卷二四八，頁1781。

<sup>159</sup> 《太平廣記》卷三九四，「陳義」條引《投荒雜錄》，頁3150。

<sup>160</sup> 蔡條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四，頁74。

<sup>161</sup> 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收入氏著，《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231；羅香林，〈古代越族文化考〉，中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印，《南方民族史論文選集》（武漢，1982）。

<sup>162</sup> 《太平廣記》卷三九四，「陳義」條引《投荒雜錄》，頁3150。

<sup>163</sup> 同前卷，〈雷二〉引《傳奇》，頁3145。

在州西南七里。咸通十二年置」。<sup>164</sup> 大致從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開始，唐朝國家即修建了正式的雷公廟，並將其納入國家的祀典。晚唐《嶺表錄異》記載，「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sup>165</sup> 所謂「連鼓雷車」，古代以雷爲鼓。雷車，雷神佈雷，將雷放在鼓上推而散之。雷州當地的百姓用連鼓雷車配享雷神。因此，前引顧雲〈天威行〉詩中有「轟轟訶訶雷車轉，霹靂一聲天地戰」。

雷神作爲雷州等地最重要的神靈，其對當地社會的深刻影響包括了生產、生活和人們的精神世界等各個方面。首先是當地有對雷神禁忌森嚴的祭法。《唐國史補》卷下稱，將彘肉「與黃魚同食者，人皆震死」。《嶺表錄異》也稱：「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投荒雜錄》記載：「人或有疾，即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既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爲唐突，大不敬，出豬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sup>166</sup> 如前所述，鯨魚是北部灣沿海航行中最大的威脅之一。我們也能看到雷神在消除鯨魚危險中的作用。大致在唐貞元（785-805）年間成書的戴孚《廣異記》記載，「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鬥，（鯨）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sup>167</sup> 唐、宋時代雷州雷神的影響既包括北部灣沿岸，也包括嶺南西部各地。《嶺外代答》記載，「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異」。<sup>168</sup> 周去非所說的「一路之民」，是指宋代包括雷州在內的廣南西路全部。然而「欽人尤異」，則說明包括江山半島在內的欽州一帶的民眾對雷州雷神廟的崇拜和祭祀特別突出。

以上我們討論唐代雷州半島盛行的雷神信仰及其對北部灣沿岸各地的影響。那麼，《天威遙碑》所揭示的高駢、裴鏘等的雷神崇拜，是否與北部灣沿岸的雷神信仰有關呢？回答是肯定的。《天威遙碑》的作者裴鏘所撰《傳奇》一書，則提供了有關唐後期雷州半島雷神傳說最詳細和最完整的記載。<sup>169</sup> 對此，我們將

<sup>164</sup> 《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九，〈雷州〉，頁3232。

<sup>165</sup> 《太平廣記》卷三九四，引《嶺表錄異》，頁3149。

<sup>166</sup> 同前書，卷三九四，「陳義」條引《投荒雜錄》，頁3150。

<sup>167</sup> 同前書，卷四六四，「鯨魚」條引《廣異記》，頁3818；卷三九三，「雷門」條引《廣異記》略同，頁3139。

<sup>168</sup> 《嶺外代答校注》卷一〇，〈志異門·天神〉，頁433。

<sup>169</sup> 《太平廣記》卷三九四，〈雷二〉引《傳奇》，頁3145-3146。

有專文討論。唐朝雷州又稱海康郡，與「天威遙」運河所在的陸州均屬於北部灣沿岸，且兩地相距不遠。公元八世紀末期，雷州一度還隸屬於安南都護府管轄。<sup>170</sup> 高駢鎮守在安南前後數年，因此對於唐後期雷州半島和北部灣沿岸的雷神信仰必然有相當的瞭解。唐代不少宦遊嶺南的北方內地士大夫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嶺南沿海等地民間信仰巫風流被的圖景。唐朝北方官員士大夫對於嶺南各地民間信仰，大概有三種態度，一是主張嚴厲禁毀，試圖移風易俗；二是因俗設教。韓愈、柳宗元、劉禹錫、鄭亞、李商隱等等都有在嶺南仕宦的經歷，其在嶺南對於大量不見於國家祀典的地方神靈，大都採取因勢利導和因俗設教的方式；三是尊崇並深信不疑。而高駢大概最具有典型性。

綜合有關高駢的歷史資料來看，高駢雖然幹練雄毅過人，但其人一生篤信鬼神。《全唐詩》卷五九八收有高駢〈南海神祠〉一詩：「滄溟八千里，今古畏波濤。此日征南將，安然渡萬艘」。該詩應是其率大軍從海門鎮沿「馬援故道」跨海收復安南途中所作。詩中透露出高駢也是將其率水軍渡海成功，歸功於南海神的蔭庇。<sup>171</sup>《嶺南摭怪》和《粵甸幽靈集錄》是兩部越南古代的民間傳說、故事和神話集，其中即收錄了不少高駢在安南時信奉道教並祭祀當地神靈的傳說。<sup>172</sup> 總之，當高駢、裴鏘等北方內地官員置身於北部灣沿岸如此普遍而濃厚的雷神崇拜的環境中，必然感受到巨大的心靈震撼，對雷神的存在及其神聖的法力篤信不疑。正因為如此，高駢才會特地在「天威遙」運河原址建有專門祭祀雷神的「神室雷祠」。

裴鏘《天威遙碑》將高駢開鑿「天威遙」能超越前人而竟克其功，直接歸因於「雷公電母」。顯然，我們今天已經不能再以「雷公電母」的神力來解釋。《舊唐書·高駢傳》提到高駢通過「作法」而除去巨石，雖然並未說明「作法」的任何具體內容，但已經暗示並不完全是人力開鑿的結果。《天威遙碑》也強調東漢馬援因「無術」而未成功。以上都說明高駢在開鑿「天威遙」的工程中曾經使用過一種完全不同於前人的「異術」。宮川尙志曾經專門討論過高駢與道教方

<sup>170</sup> 《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安南都護府〉，頁4953；《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嶺南道·安南都督府〉，頁1759。

<sup>171</sup> 高駢拜謁的南海神祠不是隋唐國家祭祀的廣州黃浦的南海神廟，應是合浦一帶沿海的南海神廟。

<sup>172</sup> 戴可來、楊保筠校點，《〈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粵甸幽靈集錄》（收入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第2冊）。

士的密切關係。<sup>173</sup> 根據我們的研究，高駢極可能使用了道教已經發現的火藥進行爆破。限於篇幅，我們將另作詳細的論證。

「天威遙」運河的開鑿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都曾經有過重要的影響。高駢〈過天威徑〉一詩稱：「豺狼坑盡卻朝天，戰馬休嘶瘴嶺煙。歸路險巇今坦蕩，一條千里直如煙。」<sup>174</sup> 高駢的這首詩應作於咸通九年（868）九月或十月，即他在離開交趾經過「天威遙」運河到長安赴任途中。《新唐書》稱高駢「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天威遙碑》記載高駢等又特地在「天威遙」等地「結構高亭，創修別館」，這些都與連通交趾的道路和驛站等有關。崔致遠〈補安南錄異圖記〉稱「天威遙」的開鑿，「遂得絕蠻獠之北窺，紆漢軍之南戍」。<sup>175</sup> 前引顧雲〈天威行〉一詩稱「雲南八國萬部落，皆知此路來朝天」。《舊唐書·高駢傳》稱「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賴之」。歷史也證明「天威遙」運河的開鑿，對於保障此後到唐末安南局勢的相對穩定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sup>176</sup> 北宋《武經總要前集》，稱邕州「南至交州界七百里，舊至交趾，水路險險，巨石梗塗，高駢在安南鑿開，迄今舟楫無滯」。<sup>177</sup> 說明至宋代前期，「天威遙」運河還在發揮作用。

越南史家 LÊ THÀNH KHÔI 指出，高駢在被任命為靜海軍節度使後：

致力於在這個被眾多混亂所分裂的地區重建秩序。他重組政府，駐軍部署在邊界，改造稅收登記。他重建了雙重城牆圍繞的大羅城。城中設有官署、財庫、軍士以及用於軍隊的五千住房。居民則生活在城牆之外的村野周圍。由於這些重築道路、開鑿航道的大型工程，這個地區逐步重現繁榮……<sup>178</sup>

歷史也證明了在高駢收復安南後，這一地區維持了較長時間的穩定和繁榮。<sup>179</sup>

<sup>173</sup> Miyakawa Hisayuki, "Legate Kao P'ien and a Taoist Magician LÜ Yung-chih in the Time of Huang Ch'ao's Rebellion," *Acta Asiatica* 27 (1974): 75-99. 另參見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傳奇》校釋》，頁84。

<sup>174</sup> 高駢，〈過天威徑〉，《全唐詩》卷五九八，頁6921。

<sup>175</sup> 《桂苑筆耕集校注》卷一六，〈補安南錄異圖記〉，頁555。

<sup>176</sup> LÊ THÀNH KHÔI, *Le Viêt-nam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Le Milieu et L'Histoir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55), p. 127;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 250.

<sup>177</sup> 《武經總要前集》卷二〇，〈邊防·廣南西路·邕州〉。

<sup>178</sup> LÊ THÀNH KHÔI, *Le Viêt-nam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p. 127; 與此相類似的論述參見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 250.

<sup>179</sup>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 250.

唐朝安南都護府的府城曾經歷幾次修建，而高駢興建安南都護府大羅城最具代表性，並且對今越南首都河內的格局都有影響。<sup>180</sup>《新唐書·高駢傳》記載高駢在安南「始築安南城」。《資治通鑑》記載，咸通七年（866）十一月，高駢「築安南城，週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sup>181</sup>根據《大越史記全書》記載，該城：

周迴一千九百八十二丈零五尺，城身高二丈六尺。腳闊二丈五尺，四面女牆高五丈五寸，望敵樓五十五所，甕門六所，水渠三所，踏道三十四所。又築堤子，周迴二千一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五尺，腳闊二丈，及造屋四十餘萬間……<sup>182</sup>

《安南志略》記載大羅城，「古交趾，漢仍之。唐置安南都護府。其城在瀘江西岸，唐張伯儀始築，張舟、高駢繼增修之。宋真宗時，郡人李功縉於此建國」。<sup>183</sup>另外，元代陳孚《陳剛中詩集》卷二有詩句：「土燹祠將壓，高駢塔未蕪」，其原注有：「高駢既定交州，遂於富良江上橋市之左立石塔，巋然猶存。」高駢修建大羅城應參照了中國傳統的城市建築樣式，因而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漢文化的一次南傳。《大越史記全書》還記載，秦始皇時，交趾慈廉人李翁仲：

身長二丈三尺，少時往鄉邑供力役，為長官所笞。遂入仕秦，至司隸校尉。始皇得天下，使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及老歸田里卒。始皇以為異，鑄銅為像，置咸陽司馬門，腹中可容數十人，潛搖動之，匈奴以為生校尉，不敢犯……

後世墓道石像即以翁仲為名。至唐朝「趙昌為交州都護，常夜夢與翁仲講《春秋左氏傳》，因訪其故宅，在焉。立祠致祭。迨高王破南詔，常顯應助順。高王重修祠宇，雕木立像，號『李校尉』。其神祠在慈廉縣瑞香社」。<sup>184</sup>「高王」即是越南史書對高駢的尊稱。高駢為李翁仲修祠廟，意在強化安南人對唐中央王朝的歸屬意識。

<sup>180</sup> 馬司帛洛，〈唐朝安南都護府疆域考〉，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四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70。

<sup>181</sup> 《資治通鑑》卷二五〇，唐懿宗咸通七年（866），頁8117。

<sup>182</sup>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頁167。按《越史略》卷上，〈高駢傳〉，頁569所記載的建築數量與此有所不同。

<sup>183</sup> 《安南志略》卷一，〈郡邑〉，頁17。

<sup>184</sup> 《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一，頁101-102。

安南人曾經在很長時期內都建立有專門祭祀高駢的祠廟。前引崔致遠〈補安南錄異圖記〉記載：「至於洞獠海蠻，莫不醉恩飽義，遠投聖闕，請建生祠。」崔致遠所作〈生祠〉一詩稱：「古來難化是蠻夷，交趾何人得去思？萬代聖朝青史上，獨傳溪洞立生祠。」<sup>185</sup> 說明安南當時就建有高駢的「生祠」。崔致遠〈安南〉一詩曰：「西戎始定南蠻起，都護能摧驃信威。萬里封疆萬戶口，一麾風雨盡收歸」；其〈收城碑〉一詩又曰：「功業已標征北賦，威名初建鎮南碑。終知不朽齊銅柱，況是儒宗綴色絲」，其詩原注有：「碑今度支裴僕射撰詞」，<sup>186</sup> 收城指其收復安南都護府交趾城。高駢在安南的戰功爲他贏得了巨大的榮譽和威望。

## 伍・餘論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環北部灣地區都是國際性的水陸交通要衝，是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通道和紐帶，因而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近十多年來，中國加強了環北部灣地區的開發，並將其視爲中國西南內陸地區通向東南亞與世界的門戶和橋樑。二〇〇七年，中國正式成立了環北部灣經濟開發區。中外學術界也不斷重新審視環北部灣地區的歷史和現實，甚至直接將北部灣稱爲「亞洲小地中海」。<sup>187</sup> 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學術界對古代嶺南西南部歷史的研究還相當缺乏。現存裴鏞《天威遙碑》對中古嶺南區域史和晚唐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文討論了晚唐裴鏞所撰《天威遙碑》的版本源流、「天威遙」運河的具體地點等相關問題，並試圖進一步說明唐朝在嶺南西部和安南地區的開拓。

漢唐時期中央王朝對安南地區的經略，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通往安南的海上通道。因此，早在漢代即有「馬援故道」的正式開闢，並在其後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和軍事作用。由於今廣西江山半島白龍尾一帶海面獨特的地形和地貌，給海上航運帶來了嚴重的困難，所以從漢代馬援到晚唐高駢都進行過「天威遙」運河的開鑿，其目的都是要在半島中部開鑿出一條貫通南北的人工航運通道，從而

<sup>185</sup> 《桂苑筆耕集校注》卷一七，頁593。

<sup>186</sup> 同前卷，頁595, 597。

<sup>187</sup>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編，《亞洲小地中海——北部灣：歷史與未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西南寧：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2008年3月14-15日）。

使來往的海上船舶避開半島頂端「白龍尾」一帶的險灘暗礁以及海上的颶風巨浪。因此，「天威遙」運河在本質上仍然是漢唐時期「馬援故道」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這條運河工程異常浩大而艱巨，因此，無論是東漢的馬援，還是晚唐以前的三任安南都護，實際上都沒有能完成這一運河工程。至晚唐，隨著安南地區形勢的日益嚴峻以及大規模戰事甫定，鑿通「天威遙」以保證「馬援故道」的暢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性。正是在這種特殊背景下，高駢繼續了「天威遙」運河的開鑿，並有可能是依靠道教發現的火藥進行爆破，最終鑿通了這條人工運河。

高駢是晚唐政壇上具有重大影響而又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其前期堪稱是唐朝國家的英雄，其晚期則是作為唐朝的「叛臣」而被載入史冊。高駢崛起於風雲變幻的晚唐時代，表現了非常傑出的軍事和政治才能。唐宣宗末年至唐懿宗咸通年間，南詔大舉進犯安南和邕州等地，對唐朝南部邊境構成了重大威脅。唐朝雖然有從全國各地徵調的數萬大軍集結在海門鎮和邕州等地，然屢戰屢敗，棄城失地，朝野憂心。最後高駢僅率五千禁軍，沿「伏波故道」一舉收復安南，結束了在安南地區持續十年之久的戰爭。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南詔再次大舉進攻成都，聲言將攻取長安。唐軍接連失利，西南大門洞開。乾符二年初，高駢臨危受命，出任西川節度使。高駢至成都後，多次大敗南詔，「自是蠻不復入寇」。<sup>188</sup>

高駢在工程建造方面也表現了非常傑出的才能，除了開鑿安南「天威遙」運河和重修安南大羅城之外，還重修了成都城。自秦漢以來，成都城在歷代屢經修築，然而以唐僖宗乾符三年（876）高駢修築成都羅城尤其具有深遠的影響。高駢的修築既大大加強了成都城的防禦功能，改善了成都城的自然環境，同時也奠定了其後一千多年間成都城市的基本格局。

高駢政治命運和歷史評價逆轉的關鍵，一是源於他在鎮守揚州期間的「玩寇」或「縱賊」，即放縱黃巢渡過淮河去攻取洛陽、長安，從而加速了唐朝的最後崩潰；二是因為其後期的「崇妖」，即完全沉迷於崇道信巫，誤國誤己。<sup>189</sup>由於高駢的所謂「縱賊」又主要是聽信了身邊寵信道士呂用之等的建議，因此，一般史家都認為，高駢的崇道信巫對於其政治命運的轉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雖然高駢與道教的關係由來已久，但是高駢受呂用之等的蒙蔽，則是在其擔任淮南

<sup>188</sup>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頁8176。

<sup>189</sup> 《舊唐書》卷一二八，〈高駢傳〉，頁4705；《新唐書》卷二二四下，〈叛臣下·高駢傳〉，頁6395；《冊府元龜》卷四四七，〈將帥部·縱敵〉，頁5304。

節度使駐節揚州以後。在風雲際會的晚唐時代，高駢以其卓越的才能被推到歷史的最前臺，一度成為維繫唐王朝國家安危的關鍵人物，但歷史最終證明在一定意義上又是他加速了唐王朝的最後崩潰。對此，我們將有專文討論。

裴鉞的《天威遙碑》恰恰撰寫在高駢人生最輝煌的時期，但是仍相當真實地展示了高駢的性格及其人生的複雜性。一方面，碑文中的高駢堪稱是唐朝國家的英雄，表現了其憂國憂民和卓越的才能，但是碑文也同樣展示了高駢內心深處對鬼神的沉迷、崇信和高度依賴。高駢在鎮守成都期間，有關崇道信巫的活動更加頻繁和走向公開化。從《天威遙碑》來看，高駢最後完全沉溺於道教和巫術並導致其政治命運的逆轉，確實應有其內在發展的軌跡和必然性。高駢是一位充滿矛盾具有悲劇色彩的歷史人物，在歷史上有過輝煌並且是那樣耀眼奪目，但隨即就被掩埋在一層非常厚重的歷史塵埃之下。在漫長的歲月中，高駢一直都只是作為一個叛逆昏聩甚至禍國殃民的反面形象而被後人不斷提及。

由於「天威遙」運河遺址地處邊陲海隅，多為人跡罕至的荒山野嶺，而且廢棄已達數百年之久，因此，長期以來差不多已經被人們徹底遺忘了。當我來到唐「天威遙」遺址考察的時候，感觸很深。晚唐國力衰頹，內憂外患，然而仍舉全國之力苦心經營安南，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唐中央王朝對南部邊疆的高度重視。在當年，這一運河工程也與唐朝國家的命運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於淹沒在荒榛溝壑中的「天威遙」運河遺址，我們今天應該設法加以發掘、保護和研究。因為這樣宏偉而艱巨的古代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漢唐國家開拓南部邊疆的象徵。

（本文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三日收稿；同年十月二十六日通過刊登）

## 後記

本文篇幅更長的初稿在廣州中山大學「隋唐五代社會與宗教」學術討論會議（2008年11月）上宣讀過。修改中先後吸收了凍國棟教授、榮新江教授、劉志偉教授的建議。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了寶貴意見。責任編輯以及編委李豐楙教授的負責精神亦令人敬佩。謹對上述諸位學者致以衷心謝意！

2009年12月25日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王逸，《楚辭章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062冊。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漢)班固，《漢書》，(唐)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漢)袁康，《越絕書》，吳平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梁)蕭統編，《文選》，(唐)李善注，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校證》，陳橋驛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賀次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唐)杜佑，《通典》，王文錦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北京：中華書局，1958。
- (唐)徐堅等編，《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唐)魏徵等編，《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新羅)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校注》，黨銀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賈二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85冊。
-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2冊。
-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宋)王應麟編，《玉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7冊。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校注》，楊武泉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范祖禹，《唐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宋)計有功輯撰，《唐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
- (宋)張君房編，《雲笈七籤》，李永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宋)張栻撰，朱熹編，《南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7冊。
-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6冊。
- (宋)曾鞏，《隆平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1冊。
-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傅根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
-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文楚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馮惠民、沈錫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6。
- (元)脫脫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越)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陳荆和編校，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4。
- (越)無名氏，《越史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6冊。
- (越)黎崱，《安南志略》，武尚清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明)《明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3冊。
- (明)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
- (明)李文鳳編，《越嶠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1997，史部，第163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58。
- (明)張燮，《東西洋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4冊。
- (明)陸應陽，《廣輿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3冊。
- (明)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6。
- (明)謝肇淛，《滇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4冊。
- (清)(乾隆)《廉州府志》，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 (清)(嘉慶)《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3冊。
- (清)《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1冊。

- (清)《雲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0冊。
- (清)汪森，《粵西文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67冊。
- (清)汪森，《粵西叢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67冊。
- (清)阮元主修，《廣東通志金石略》，梁中民校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 (清)易紹修，封祝唐纂，《容縣誌》，收入《中國方志叢書》第196號，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1989，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本。
- (清)金鉷等編，《廣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6冊。
- (清)徐延旭，《越南山川略》，收入(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杭州：杭州古籍書店影行，1985，第12冊。
- (清)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謝啓昆等編，《廣西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680冊。
-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廣文書局，1979。
- (清)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賀次君、施金和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
- (越)《同慶地輿志》，河內：世界出版社，2003。
- (越)《皇越一統輿地志》，巴黎：法國亞洲學會藏本。
- (越)潘清簡、范春桂等纂修，《欽定越史通鑒綱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1969。
- 《粵甸幽靈集錄》，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第2冊。
-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潘文閣、蘇爾夢主編，《越南漢喃銘文彙編·第一集·北屬時期至李朝》，巴黎：法國遠東學院，1998。

## 二·近人論著

戈岱司(法)編，耿昇譯

1987 《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北京：中華書局。

王承文

2007 〈晉唐時代嶺南地區金銀的生產和流通——以敦煌所藏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爲中心〉，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505-548。

2009 〈越南現存〈大隋九真郡寶安道場之碑文〉考釋〉，《文史》89(2009.4)：59-86。

王承文

王夢鷗

1971 《唐人小說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

伯希和（法）撰，馮承鈞譯

2003 《交廣印度兩道考》，北京：中華書局。

李宗爲

2003 《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

沈福偉

1986 〈兩漢三國時期的印度洋航業〉，《文史》26：35-56。

凍國棟

1997 〈顧雲籍貫、歷官考〉，陳國燦、劉健明主編，《〈全唐文〉職官叢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頁417-419。

徐松石

1993 《粵江流域人民史》，氏著，《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馬司帛洛

1962 〈唐朝安南都護府疆域考〉，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四編》，北京：商務印書館，頁54-102。

曾昭璇

1994 《嶺南史地與民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馮漢鏞

1986 〈宋代國內海道考〉，《文史》26：135-148。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編

2008 《亞洲小地中海——北部灣：歷史與未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西南寧：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2008年3月14-15日。

戴可來、楊保筠校點

1991 《〈嶺南摭怪〉等史料三種》，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羅香林

1982 〈古代越族文化考〉，中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印，《南方民族史論文選集》，武漢。

嚴耕望

1986 《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LÊ THÀNH KHÔI

1955 *Le Việt-nam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Le Milieu et L'Histoir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Maspero, Henry (馬伯樂)

- 1918 "L'expédition de Ma Yua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8.3: 11-30.

Miyakawa, Hisayuki (宮川尙志)

- 1974 "Legate Kao P'ien and a Taoist Magician LÜ Yung-chih in the Time of Huang Ch'ao's Rebellion." *Acta Asiatica* 27: 75-99.

Schafer, Edward H. (薛愛華)

- 1967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ylor, Keith Weller

- 1983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Gao Pian's Construction  
of the An'nan Tianweiyao Canal During the Late Tang Period:  
Discussion of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ianweiyao Tablet"  
Composed by Pei Xing

Chengwen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fter commanding an army in the recovery of the An'nan protectorate (安南都護府) from the Nanzhao regime during the Xiantong period (860-873) of Tang Emperor Yizong's reign, Gao Pian (高駢) built a canal called Tianweiyao (天威遙) so as to provide the An'nan region with a route to the sea. The most immediate reason behi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anal involved the necessity of transporting large amounts of military supplies to the An'nan region, but the deeper reason motivating the construction wa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such a sea route would play in the politics, military affairs, and overseas trade of the Tang dynasty. Tianweiyao had a profound impact at the time of its construction, and it was to continue to exercise such an impact into later periods as well. Compared to specific but brief records about Tianweiyao found in sources such as dynastic histories,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ianweiyao Tablet," composed by one of Gao Pian's staff, Pei Xing (裴鏘),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of Tianweiyao in great detail and is thus of significant historical valu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ircul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ianweiyao Tablet" throughout history, the precise location of Tianweiyao,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n'nan sea route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ianweiyao Tablet," along with various other materials, attribut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canal project to the Lord of Thunder (*Leigong* 雷公) and the Mother of Lightning (*Dianmu* 電母), a phenomenon which reflec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er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literati and the Thunder God belief popular along the Gulf of Tonkin (北部灣) coast.

**Keywords:** late Tang period, Gao Pian, An'nan protectorate , Tianweiyao canal,  
Gulf of Tonkin